

編 者 的 話

今天，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意气风发地为把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下，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我們东北地区 and 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写出了許多家史、村史、社史、工厂史，以及其他各种专题史。这些史料揭露了旧社会統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后当家做主和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这些史料，是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它能够使我們（特別

是青年一代) 了解什么是旧社会, 什么是剥削和压迫, 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能够使我们不忘过去苦, 憎恨旧社会, 从而更加热爱今天,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些史料同时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继承并发扬老一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艰苦奋斗,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地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从东北地区的“四史”材料中选出一部分, 编成《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陆续出版。由于编辑水平所限, 加上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情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 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編 者

1965年2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伐木工人站起来.....	1
加热炉旁話苦甜.....	14
在苦难中搏斗.....	26
憤怒的火花.....	40
苦难的童年.....	51
辛酸的学徒生活.....	63
两代装卸工.....	72
碼頭工人的昔泪今歌.....	80
一个油工的今昔.....	90

伐木工人站起来

铁力林业局伊吉密林场主任 马永顺 口述

小 凤 整理

在旧社会，我们林业工人受尽了日本鬼子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多少人流血、流泪，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多少人悲惨地死去，喂了野兽。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我马永顺的骨头渣儿早就没了，更谈不上当家做主了。

走投无路进森林

一九一四年，我生在河北省宝坻县沟头庄的一个贫农家里。爹给地主扛活，我跟着娘讨饭。我十四岁那年，娘给地主做饭，我到地主家织布房当杂工。就是这样，也还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九三二年春节后，爹和娘就领着我哭别了家乡，跑到河北省柳江煤矿。在柳江一无亲，二无故，找不到活干，爹只好挑水卖，娘到街上缝补破烂，我有时卖零工，有时捡煤核，生活还是没有着落。后来，爹和我到煤

矿干活，一連干了三年，不但沒掙到錢，連件囫圇衣裳也沒混上，变成了“窑花子”。爹和娘觉着在柳江呆下去也沒好了，怕我把骨头扔下，就咬了咬牙，叫我逃出这个吃人的地方，另找出路。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一个人步行到了天津。到那以后，无处投奔，找职业又找不到，整天瞎跑。后来听说有招工的，我便找了上去，在那里碰上了家乡的高洪田等十七个人。我們一起随招工的把头到了吉林省汪清县，給日本鬼子开的“大东公司”往山上修铁路。去的那天，正赶上上下着漫天盖地的大雪，我們身上穿着露肉的单衣，冻得哆哆嗦嗦。后来，我們冻得实在受不了啦，有的人就披上了洋灰紙袋子。紙哪能御寒呀！挨冻不說，再加上吃不飽飯，不到两个月工夫，我們一起去的十八个人，就折腾死十个。剩下我們八个人，一看再干下去也沒有了，便偷着逃到小丰满去修水电站。那里的日本鬼子对工人更殘暴，劳动时，看誰干得慢点或直直身子喘口气，就是一頓暴打。我們实在忍受不了，干了不到两个月，又逃到吉林。

到了吉林，住在一家小店里。这时，我們的衣裳已經破烂不堪了，想掙几个錢添件衣裳，可又冻得出不去門。无奈，我們就把八个人的衣裳集中起来給四个人穿，輪班去給日本关东軍往火車上装羊草。可是掙来的錢，除了吃飯，連店錢都付不起，哪有剩錢买衣服。正当我們被逼得沒招的时候，黄泥河林区一个叫張永爽的把头来招工，他花言巧語地

說：“山上吃得好，住得好，掙錢又多，干活前先發給二十元錢。”我們聽他一說，雖然不太相信，但總以為反正在這強，就跟他去了。

我們到了長白山黃泥河溝里北大秧。把頭把我們領到工人住的地窰子裏。裏邊黑洞洞的，又潮又濕，腥味、臭氣熏人。工人都是渾身打渾身睡在草鋪上。好多工人由於受潮濕，全身生瘡長疥，流膿淌血。工人吃的是發霉的苞米粒，還不管飽，有的人吃得都拉不下屎來。我們看到這種情形，心裏涼了半截，知道是受騙了，要是干下去也不會有好結果，不如早點離開。我們就向把頭張永爽提出要走，他兩手叉腰，冷笑一聲說：“來不來由你，讓走不讓走由我。哪個敢走，我打斷他的腿！”我們無處分辯，這個地方又很偏僻，離交通要道很遠，想跑也跑不了，只好忍氣吞聲地干下去。

險 遭 毒 手

舊社會的林区就象一座監獄。當時，我們那兒流行着這樣一首歌謠：“到了長白山，兩眼淚漣漣，活着剩把骨，死了扔山澗。”不管刮煙兒雪、下暴雨，天冷天熱，我們都被趕到山上去干活。日本鬼子和把頭對工人非常凶狠，張口就罵，伸手就打，逼得大伙心裏怒火往上冒，人人都恨透了這些鬼子、漢奸，恨不得一口把他們吃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把頭叫我們去修建夏天流送木材用的

水閘。當時，河雖然還沒有開化，但冰面上有水，在冰上干活，鞋和褲子總是濕漉漉的，一連二十天，身上沒有干的時侯。最坑人的是下水綁“三鷄子”（立木樁），水里扎骨的涼，腿腳一會兒就凍木了，上了岸，冷風一吹，身上都掛了“蜡”，凍得硬邦邦的。好多工人冰得大腿抽筋，腿肚子起筋疙瘩。有一天，我和幾個工人凍得全身麻木，實在挺不住了，從水里爬出來，沒料到一個日本鬼子一扒鉤子把我打到水里。我心里氣得鼓鼓的，真想和他拚了，可是全身已經一點勁兒也沒了。大伙憋着滿肚子怒氣，把我架到岸上，剛攏着火想給我烤一烤，那個日本鬼子氣勢汹汹地用棍子把火扑灭打滅了。恨得我牙根兒疼！

原說修完水閘給開支，哪曾想把頭到時又變卦了，說流送完木材再給錢。我們只好等着流送木材。河開化不久，就開始“趕羊”（流送木材）了。“趕羊”遭的罪真是一言難盡啊！不管白天黑夜，陰天下雨，也不管有多大危險，鬼子和把頭硬逼着我們順河跟着木頭跑。有的工人到河里挑垛（把在水里聚成堆的木材垛挑開），被木頭砸到水里淹死。鬼子、把頭是不管你死活的，有口氣就得干活。

“趕羊”趕到黑石屯，由於連雨天河里漲水，把那里的水閘沖壞了，大部分木頭順水跑了。日本鬼子硬逼着我們去截木頭。上哪截去呀？木頭出了閘象放箭似地跑了，怎么能截回來呢？我們不干！把頭張永爽威脅說：“日本掌櫃說了，不把木頭截回來，不給開支！”我們心里明鏡似的，知

道这又是耍花招，宁可不要钱也不去截木头。

張永爽没办法，就叫我们去修冲坏的水闸。谁知道日本鬼子怀恨在心，想法找斜碴陷害我们。有一天，我刚把铁绳拉上岸，一使劲，铁绳碰到一个日本鬼子的手上，把他的白手套给弄脏了，这小子走过来就恶狠狠地打我，我问他为什么打人，他啥也没说，照我脸上又打了几巴掌。我气得身上直哆嗦，心想，你这日本鬼子也太欺侮我们中国工人了，今天，非得给你个厉害看看，我扭住他就撕扒起来。我们俩滚在了一起，一下子滚到了河里。我按着他的脑袋，灌得他直“嘎儿嘎儿”。在岸上的工人高兴地拍手叫好：“老马，叫他喝顿汤，管他个饱，叫他尝尝咱们工人的厉害！”有些老工人怕把事情闹大，才劝我把他放了。

不大工夫，日本大把头佐藤领着两个特务来了，把我带



到佐藤大柜。佐藤恶狠狠地誣賴我：“你的，日本人的打了？”我說，“日本人打我……”沒等我說完，他啪就給了我一個嘴巴。接着，連罵帶打起來，把我打得耳朵嗡嗡响。我气得扯住他的衣裳，他拿起電話耳机子要打電話，我一腳把電話机踢翻，抱起電話机要砸他。這時又竄上來一個鬼子，拿扒鉤子向我打來。我一看不好，一閃身就竄到門前的柁子垛上，操起柁子和鬼子打開了。佐藤正要掏槍，外面傳來一陣喊聲：“不許打老馬！不許打老馬！”幾十個工人拿着壓角子、刨鉤闖進院子，把我裹在人群里。日本鬼子一看我們人多勢眾，也就沒敢怎樣。回到工棚，工人告訴我：“老馬，快走！不然抓到憲兵隊就完了。”我連夜逃出了這個鬼地方。

殘酷压榨

在舊社會，我們林業工人到哪都是受壓迫、受剝削。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跑到了鐵力朗鄉南溝林區。真是從屎窩里挪到屎窩里。這裡的活重不說，鬼子、把頭更刻薄。這兒的把頭是日本人，叫鈴木，對工人的剝削非常殘酷，而且下面的小把頭還層層扒皮。鈴木在上邊包的活是采一米木材給一元工錢，可是他扣下一半，只給小把頭五角。小把頭又扣下三角。小把頭下邊還有帶工的“二頭”，他白吃白喝不干活，一個人却掙兩個人的錢；一個工棚子還有一個管賬先生，也是白吃白喝。經過大小把頭這一克扣，工人連兩角錢

都分不到。逢年过节，工人多少得到几个錢时，这帮吸血鬼还采取种种办法在工人身上揩油。他們借“儲蓄报国”、“献納”等名堂，搜刮工人的血汗。至于放賭“抽紅”、借錢不还更是常事。

这样殘酷的剝削，鬼子、把头还觉得不过癮，有时干脆把全部工錢拐跑。我在这里拚死拚活地干了一年，指望发几个錢做件衣服，誰知到开支时，大把头鈴木把錢拐跑了。这是我們七十多个工人干了一年的血汗錢，都叫他一个人独吞了。大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那个世道，哪儿有咱工人說理的地方！我們不但白干了一年沒得到工錢，后来就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了。我們被逼得沒有办法，在十一月間集体离开了朗乡。

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們一連跑了二三年，也沒找到一个站脚的地方。从黄松甸子到蛟河，从蛟河到山河屯，从山河屯到图們，回过头来又跑到江北大同沟、沙房子、泡子沿，……几乎跑遍了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跑来跑去，到哪都是受剝削受压迫，身上穿的仍然象个要飯花子。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又跑到黑龙江省浩良河林区。这里的把头更毒辣，讲剝削工人沒有他不使的招儿。大把头姓李，一只眼，外号叫“独眼龙”。下面有个二头，叫刘利福，自称“大力神”。大把头利用他专门坑害工人。新工人来了，刘利福就叫抬大木头，抬不动就不要，若是干半截頂不住了，就算“帮洋工”。那份“帮洋工”的錢，把头就揣到自己的腰包。不这样，你

就找不到职业。逼的沒招，工人就得先花錢买通他，或請客送礼。好多工人不知道这个“規矩”，上工几天就給压坏了。有的工人被压得吐血，有的掉了膀子，有的掉到跳板底下摔死。我上工的头一天，“独眼龙”想叫“大力神”把我压垮，好白得“帮洋工”錢。上午“大力神”叫我和他搭肩抬一千多斤重的木头，下午临收工时，他又特意选了一棵两千多斤重的造船材。平时抬这么大的木头得八个人，这次四个人抬，“大力神”和我两个人抬大头。他以为这下子可以把我压垮了。其实，工人兄弟早把他的底細告訴我了，头晌干活时我就留着劲儿，等到抬大木头我才拿出劲来。結果不但沒把我压坏，反倒把“大力神”压坏了，这小子从跳板上跌下去蹿了个半死。从这以后，“独眼龙”就再也不敢輕易叫“大力神”这么坑害新来的工人了。

在死亡綫上

一九四三年，我随把头韓玉昌到了南岔林区。这时，日本鬼子和把头对工人的統治越来越殘酷，工人的生活越来越悲惨。我在南岔林区一連干了两年，鬼子和把头不但不給开支，还不让下山。大家穿的“更生布”和麻袋片做的衣裳，都破烂不堪了，許多人赤身露肉。夏天还好过，一到冬天，时常有被冻死的。吃的也越来越坏，橡子面和雪高粱面不光吃不飽，有时还常常断頓；夏天吃野菜，冬天吃树皮。工人餓得皮包骨，干活一点力气都沒有。鬼子和把头却不顧工人

的死活，硬逼着我們干活。

那时根本也没有什么安全設備，每天都有工人被砸死砸伤。一天，我在归楞（把木头抬到指定的地方堆起来）时，腿被木头挤撞了个一尺来长的大口子，血象放“箭”似地往外流，疼得我昏过去了，等工人把我抬回工棚子后，才慢慢緩过来。我在地窖子里折腾得死去活来，可是鬼子、把头不仅不管，还臭罵死了活該！工人兄弟們看我折腾得实在不行了，就凑了几个錢把我送到铁力伪协和医院。可是那医院不是給咱工人开的，他們連看也不看，就說不收。送我的工人再三哀求，才算把我收下。收下也不好好給治，把伤口給縫上就算了事，二十多天只給換了三次药，后来伤口化了膿，臭味熏人。医院就要把我的腿截掉。我一想，沒有腿就不能干活了，那不就得等着餓死嗎！我不同意，医院就不管了，把我送到重病人房里。最后，我的伤口还没好，医院就把我撵了出来。我在铁力南門外一家小店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将就着去上工。从那以后，就落了个疔瘡腿，每年三四月間就犯病。

抬木头归楞，全仗动力气，吃不飽，活又累，我实在干不了啦，一九四四年我又去伐木头。伐木头这活非常危險，一时不注意就得把命搭上。那时，日本鬼子和把头为了掠夺和剝削我們，根本就不管工人的死活。头一天伐树，我干拉鋸也拽不动，除了跑鋸就是拉歪了，成了馬蹄子式，干着急就是拉不下来。第二天一棵树剛鋸了一半，树就打半子啦，一

下子就把我砸倒在树底下，我立时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才苏醒过来。那时，山上经常有被“回头棒”（斫起来的树干）、“吊死鬼”（树上的断干枝）打死的。有一次，我刚把树锯断，就被“回头棒”打破脑袋，鲜血顺脸往下流。工人兄弟给我用腿捆绑上架回去。养了几天，伤还没有好，把头就逼我干活，嘴里还臭骂：“熊蛋包，废物！”还指着我的鼻子说：“要象你这样，连铺底钱（干活前给的钱）也挣不来！”

鬼子、把头心狠手毒，工人被砸死，不用说给安葬费，连棺材也不给买，囫圇个给扔了。有一次，伐木时，砸死七个人。鬼子、把头不但没有什么表示，而且把尸体给扔到山坡上。第二天，尸体被熊瞎子啃得只剩下一些骨头架子。我们看到这种情景，心里真是又难过又愤恨。难过的是工人兄弟死得太惨，活着遭罪，死了喂了黑瞎子；恨的是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鬼子把头，竟残忍到这种地步。我们联想到自己将来的命运，每个人心里的怒火简直要冒出来！我们不甘忍受这非人的虐待，都想同他们拚了。第二天，工人全不下场干活了。工人一罢工，鬼子、工头就用迷信来骗我们，说是“山神爷”见了怪，该河里死井里就死不了。可我们心里明白，什么“山神爷”见了怪，是他们不关心工人生命安全的结果。我们不听他那一套，坚持同他们作斗争。有一次，我们故意放一个“罗圈挂”（几个树放倒在一起），等鬼子、把头上山时，趁机把树拉倒，几乎把这些家伙砸死。

換 了 人 間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汉奸、把头也夹着尾巴溜掉了，我們也都下了山。党接管林区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們工人也都紛紛回到了林区。我回到林区的那一天，国家发给了棉衣、棉被、棉帽子、皮袜子、腿棚、手閤子。为了欢迎我們，当天中午厨房还做了大米飯、粉条燉猪肉。当我穿上新衣裳，吃到香噴噴的飯菜时，心里有說不出来的高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大干一場。开山以后，我在六十天当中，就采伐了一千二百立方米木材，相当于六个人一冬的生产量。一九四八年，我被选为林区的特等劳动模范，第二年春天，又被选为黑龙江省的特等劳动模范。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天夜里，我反来复去地睡不着，我想，和我一起从家乡出来十八个人，死了十七个，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这条命也早就完了。想到这里，我全身觉着有使不完的勁，干起活来，簡直忘了什么叫累。

一九五二年，党送我到哈尔滨林区工人扫盲学校学习了三个月，使我这个一个大字不識的睁眼瞎子見了光明。現在，我不但能看报看书，还能写简单的工作計劃、总结。以后，领导又送我到带岭林业局学习油鋸技术，經過一年多的

学习、锻炼，使我成了一个熟练的油锯手。我们林区也都扔掉了歪把锯，实现了机械化伐木。一九五五年，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全国各族兄弟、各界人士代表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使我最难忘的是，在政协礼堂，见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还有刘主席、朱委员长和周总理。当时，我不知说啥好了，不知怎的喊起来：“毛主席你好啊！”毛主席握住我的手说：“好！”顿时，我的眼泪唰唰地掉下来。我一个林业工人，在旧社会被人称为“山狗子”，可是今天成了国家的主人，见到了党和国家的领袖，这是做梦也万万想不到的事啊！

从北京回到林区，我的干劲就更足了，我更加热爱林业工作。当天，我就伐了二十多立方米木材，超过定额三四倍。我们小组的工人，听说我见到了毛主席，也都特别高兴，都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和国家对林业工人的关怀。这一年，全组平均超过定额百分之三十五，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全国政协会议以后，我先后到几个国家去参观访问。一个普通工人，能坐上飞机出国访问，这在旧社会怎么能想象得到啊！

一九五九年，我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亲自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当我投票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代表工人阶级在投票，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啊！在十年大庆那天，我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

参加观礼。晚上，周总理設国宴招待外宾时，还叫我去陪外国客人。在宴会上，許多外国朋友問我叫什么名字，我說，“我叫馬永順，是伐木工人。”他們听后就高兴得把我抬举起来，还在我胸前挂滿了紀念章。

全国人代会以后，我回到了离別二十四年的故乡——宝坻县沟头庄。我的爹娘和邻居見了我是多么高兴啊！爹和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想起我在一九三五年回到家乡的情景：穿的衣裳破烂不堪，象个要飯花子，不敢进屯子。当时，有錢的人說：“从小看大，三岁看老，沒出息！”还有的說：“沒喂关东城的狗就不錯！”这次回去，老人們都笑了，“你小子有出息，有志气！”我說：“要不是共产党，哪有今天！”

从一九五五年以后，我連續被选为全国的先进生产者。

回想过去，看看現在，怎不叫人从心眼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痛恨那万恶的旧社会啊！我現在是全国人民代表，全国先进生产者，铁力林业局党委委員，又是林場主任、采集工程师。我知道，这些荣誉是党和毛主席給的，是人民給的。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我的全部力量来建設林区，把我們的国家建設得更加美好，更加富强，保住我們的江山，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終生！

加热炉旁話苦甜

鞍鋼小型軋鋼廠工人 藍樹功 口述

林兆桐、陳秉文 整理

我是鞍鋼小型軋鋼廠的加熱工人，今年五十一歲。

我的老家就在鞍山市西郊。爷爷、爹爹常年給地主扛活，累断脊梁骨，种出来的粮食灌满了地主的粮仓，我們一家人却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我十三岁那年，为了減輕家里的負担，爹就把我过房給二大爷做继子。十五岁那年，我就給地主胡黑帽子家当半拉子，受尽了苦难的煎熬。一九三五年，我二十一岁那年的春天，和本村一个姓毕的姑娘結了婚，到冬天，就添了大女儿。家庭的生活担子更加重了。

就在这时候，日本鬼子要占用我們村里的土地修工厂。一天，一队日本鬼子兵和汉奸冲进了村。不大工夫，村里的土地都被他們釘上了木牌子。土地被日本鬼子霸占了，房子被扒了！逼得村里人无家可归，沿街乞討。我也随着大伙流入鞍山市，靠做卯子工（临时工）度日子。

一九三六年，那年我二十二岁，到伪滿昭和制鋼所第二压延課下面的小型厂（現鞍鋼小型軋鋼厂）当卯子工。每天天不亮，就得到厂門外站队領工牌。赶上了机会，領到了工牌，能干一天活，掙三角一分錢，供一天吃的；来晚了，工牌放完了，就得白跑一趟，一天干不上活，老婆孩子就得跟着餓一天。

为了养活老婆孩子，有些穷朋友劝我想办法变牌子工（在籍工），牌子工比卯子工一天多掙七分錢，也省得天天站队領工牌，担惊受怕的。可是，工厂賬房里管劳工的韓成春，公开規定了勒索工人的价碼，卯子工变牌子工，要給他送十元錢，若到主电室工作，还要交二十元，就是进厂当勤杂工，也得送給他十元。我没有錢，托人說情，讲定变牌子工后再补交，他才点了头。

剛变牌子工那个月，不到开餉的日子，手头早一个錢也沒有了，家里揭不开鍋盖，一家三口張嘴等着吃，吃什么呢？只好挖野菜，弄点豆腐渣熬湯喝。好容易盼到开餉那天，我高高兴兴地去領餉，等接过餉袋一看，上面画了个圈，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沒有，我急忙去找开餉的人，那人冷冷地說：“你这个月的餉叫韓先生扣去了。”

当时，我头上就象挨了一棒子，“噲”的一下，天哪！叫我一家人可怎么活啊！回家剛一进屋，孩子她媽就說：“孩

子餓坏了，快去买点吃的吧！”

我什么話也說不出来，就一头扑到炕上躺下了。后来，还是穷兄弟們的帮助，才勉强对付过了这个月。第二个月开餉，也只能买几十斤粮，一家三口人，只能过着半饥半飽的苦日子。

当时，我們鞍山工人都知道这样几句順口溜，

南山（现烧結总厂）是大猪圈，

制鋼（现第一煉鋼厂）是阎王殿，

要吃小型飯，

就得拿命換。

小型軋鋼厂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开建的，一九三五年开工生产。当时，厂里的一切政治、經濟和技术管理大权，都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平均工资，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过十倍。日本課长一个月挣七八百元。他們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楼房，上下班坐汽車，重活、累活全支使咱中国工人干，还不給劳动保护品。当时，工厂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在加热炉旁操作的工人，每天得在几百度的高温下劳动八九个小时，喘口气、上厕所的时间都沒有。炉內的火苗噴出一米多远，我那时就凭着身上穿的露肉的衣服，脚上穿着漏底的布鞋，站在炉前抽那燒得火紅的鋼坯，炉內噴出的火焰里濺出通紅的細铁屑，落在身上和脚背上，燙得皮焦肉烂，也只得忍受着。那时，咱工人有了工伤，不但不給治疗，連工錢都不給，休工超过一个月，就被开除。

我們工人每天出入工厂大門也不容易，伪昭和制鋼所有四个大門，規定每一昼夜只开三次門，每次一小时。比如上白班，只在早晨七点至八点开門，你要上工，非得在这个時間赶到，迟到一分钟就别想进去；来早了又不让先进，就得站在那等着。有时，鬼子警备队看人来多了，怕人多鬧事，就用水龙头把工人冲散。我那时上下班，家里哪有钟表啊！每逢夜班，就看三星，三星出来一杆子多高，我就得走到崗門前去等着。特别是冬天的雪夜，寒风刺骨，我餓着肚皮，穿得又少，也只得站在那硬挺着挨冻。手冻僵了，用嘴哈一哈；脚冻木了，就来回走走。好容易盼到黑铁大門嘩啦一声打开，我們又都走进这人間地獄。

下班的时候，無論天怎么冷，都得排上队，打开鈕扣被搜身。日本鬼子把中国工人不当人看待，动不动就誣蔑我們是“小偷”。誰稍不留意，干完活后，在兜里留下顆螺絲帽什么的，被搜出来，輕則挨馬棒、皮鞭，重則折磨致死。

当时，在伪滿昭和制鋼所干活的中国工人，沒有一个沒挨过日本鬼子打的。

有一次，我把装料机开歪了，日本鬼子希田沒容分說，就打了我一頓耳光子。还說：“你的良心大大的坏！”要送我进“矯正輔導院”，后来經大伙說情才算了事。我想，我这大小伙子到什么地方还不掙碗飯吃，何苦要受这份气。我东跑西顛，到处找活干，一連二十来天沒有上班，也沒有找着活干。家里本来缺吃少穿，現在就更沒法过了。有的工

人弟兄劝我说：“老蓝，上班吧，自己挨饿事小，老婆孩子要活命啊！”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又去上班。

在苦难生活的折磨下，使我逐渐学会了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有一天，我又去开装料机，鬼子要钢料，我开慢了一点，他就大发脾气：“快快地！”我一赌气，就把装料机开得飞快。把钢坯都推到加热炉内，把抽钢的炉门也堵死了，一千二百多度的钢坯堆积起来，就象要爆发的小火山一样，烤的四处冒烟，巴巴直响，谁也不肯上前。这一下子日本鬼子可吓蒙了，只好停轧处理。事后，日本鬼子找大伙开会追查原因。大伙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太君下的命令，老蓝照办，老蓝没有错。”日本鬼子一看人多势大，又怕把自己也连累上，没敢声张，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鞍山对工人的统治更加残酷，在工厂内建立了特务组织，还设立了警备室，在车间、工房到处都有监视工人行动的特务，工人稍有言行不慎，便被视为“反满抗日”，送往“矫正辅导院”折磨致死。他们还对中国工人实行了奴化教育，强迫中国工人学日语。不仅如此，连穿衣吃饭也实行了“配给制”，中国工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轻则罚款，重则蹲监狱。在名义上，咱钢铁工人每人每月“配给”二十八斤红高粱米，可是，都由他们统一管理，每天到饭房吃饭，每人一顿饭只给一碗，连半饱都吃不上。穿的衣服是糟烂的“更生布”，一搯一个大窟窿。谁身上都结着疙瘩，挂着布片。

在那样的岁月里，咱工人一个人养活一个人也难，何况我已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过的苦日子，就更不用提了。

一九四三年，我老婆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二小子），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奶，成天哭嚎。没有布包，用破棉絮包着。老婆在月子里，因为成天吃糠子面、糠窝窝、棉籽饼，消化不了，总拉肚子。嘴都供不上，哪有钱治病？就这样，病情越来越重，拉到后来，身上瘦得就剩下骨头架子了。我眼看着老婆病成那个样子，心如刀搅，也想不出办法，只得咬着牙让眼泪往肚子里流。一天，我老婆有气无力地哭着对我说：“我是不行了，你好好抚养孩子……”话还没有说完，头一歪就断了气。孩子们趴在妈身上哭呀，叫啊，个个哭成了泪人。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邻居见了也都难过得流下眼泪。但是，哭又顶什么用呢？死人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连夜就抬出去埋了；活人怎么办呢？我那二小子在月窝子里就失去了亲娘，怎么活下去啊！我左思右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狠心，只好把他送人了。可是，不到十天，人家又把孩子退回来了，说是没法养活。我接过孩子一看，已经瘦得不象人样了。回来没过几天，他就活活地饿死了。四岁的大小子，留在家里无人照管，饿得跑到外面垃圾箱里拣着什么吃什么，后来得了痢疾，无钱医治，不久也活活地病死了。就这样，不到几个月的工夫，我就落了个家破人亡，只剩下我和大女儿了。

二

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日本鬼子投降了，我高兴极了。心想：祖国光复了，我們再也不当亡国奴了，今后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但一想到往后的事，心里又犯了愁，自己出工了，家里連个看門的人也沒有，咋办呢？正在这时，咱远房叔叔的邻居，一个姓王的女人，她丈夫在一年前死去了，留下一个女儿，她家也是吃上頓沒下頓，生活无法維持。經人介紹，我們两家就并成了一家人。这样，我又第二次成了家。打这以后，我就眼巴巴地望着过好日子。可是，誰知道，日本鬼子走了，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这群豺狼，他們个个都想往自己兜里摟錢。国民党反动派的軍队以修建防御工事为名，进入鞍鋼拆卸机器盜卖；国民党的接收大員和当时的守卫队更是明目張胆地破坏設備，盜卖物資，使許多工厂不能开工恢复生产，許多工人失了业，四处流散。我沒有什么地方可去，还留在小型厂当加热工人，每天工資只掙伪东北九省流通券三百六十元。当时如果市場价格稳定，每月工資还可以买高粱米一百多斤。可是，那时候物价极不稳定，官商勾結在一起，一到工人开餉的日子，粮、油、盐等物价一日数漲，連水也得貴三分。因此，我一个月开的餉，就是全部买粮，也只能买到七十斤高粱米，够一家人吃半个多月的，还有其他日用开支、房租、水电怎么办呢？一家人只得勒紧褲腰带过日子。

到了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作垂死的挣扎，更加紧了对工人的压榨。滥发纸币，物价直线上升，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就这样，喝人血吃人肉的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满足。到后来，给工人发餉連纸币也不发了，只开支票。支票在市场上买东西一元只算七角，商人还不愿意要。再到后来，干脆連支票也不给开了，連續干了三个月活，沒有开工錢。

一九四七年秋，工厂关板了，我也失业了。沒有工做还指靠什么过日子呢？家里东西卖得淨光，只剩下一口破鍋和一床破得象网兜一样的破毯子。一家人都光着脚，露着肉，只有老婆身上穿件遮身的大布衫。家里揭不开鍋，一个个餓得抬不起头来。老婆带来的小女儿餓得哇哇直嚎，后来連哭的勁也沒有了。老婆和大孩子坐在炕上流泪，我呆呆地蹲在炕上。逼得实在沒有办法可想了，老婆把身上仅有的那件遮身的大布衫脫下来，递給我說：“把它卖了，买点粮食吃吧。”我不忍心地說：“你只剩下一件貼身的短褂和一条褲衩子，怎么行呢？”她說：“別管我，买来吃的再說。”說着就嗚嗚地哭起来。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孩子哭，老婆叫，呼天喊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門，我含着眼泪卖掉了老婆的大布衫，买了二斤苞米面，吃了几頓。还怎么办呢？我只好把老婆带来的小女儿送到她叔叔家。那年头，穷人都难，那孩子送走不几天就餓死了。老婆拖着怀孕八个多月的笨身子，哭得死去活来。

这时，大女儿的叔伯舅父到我家来，看孩子大人都饿成那样，就劝我说：“快把孩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去吧！找条活路，总比留在家里饿死强。”

让自己的亲骨肉给人家当童养媳，吃苦受罪，我怎么能忍心呢？可是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我只好咬紧牙，把孩子给人了。临走时，孩子抱着我的大腿哭喊：“我不去呀！死也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这时，我的心象刀搅似的，低下头不敢看孩子，等我抬起头来，孩子已被人领走了。

孩子走的走，死的死，剩下我和老婆俩过了几天，真是山穷水尽。老婆又瘦又弱，躺在炕上连气都喘不上来，我看着她那笨重的身子，就联想起死在月子里的前妻和孩子。在这空无一物，冷如冰窖的屋子里，每天见不着一粒粮食，要坐月子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救他们母子性命，我翻来复去想了几天几夜，最后只得含着眼泪和老婆商量：“咱俩夫妻一场，就此到头吧！你就早点另找个人家，逃活命去吧！”

老婆听了这话，伤心地哭喊着：“不！不！我哪也不去，我们死也死在一块。”说着就拉住我，不住声的痛哭。

我忍住泪劝她说：“干么要死呢！你是两条命，应当赶快找条活路，兴许将来还能过好日子。”

我劝了她好几天，她哭，我也哭，我们俩的眼泪都哭干了，最后她同意了。

就这样，我又被逼得妻离子散。老婆离开家的时候，我一头扎在炕上，昏了过去。

三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鞍山解放了。从此受尽苦难的劳动人民，跳出了苦海。我这个只差一口气没有断的人，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鞍山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发给失业工人救济粮，给我九十斤苞米面。领粮那天，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真是“爹亲娘亲，没有共产党亲”。爹娘生下我，养活不了我，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过了不几天，政府就组织老工人登记。当时东北还没有完全解放，我解放区军民的中心任务是支援解放战争。为了防止残余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工厂，党指示我们工人组织了护厂队，保卫工厂，迎接胜利，迎接开工。

这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又愉快地回到了小型轧钢厂。这时的鞍钢，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两次破坏，厂房的周围都长满了一尺多高的蒿草，狐狸、野兔在厂房内窜来窜去。马达、轧辊丢的丢，坏的坏，各项设备都残缺不全，应手的工具也没有多少了。我看到这些，心里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党又派来干部，向我们讲解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工人阶级的责任等。句句话都合我们工人的心意，我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些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个亲切的称呼，第一次感到当了国家主人的幸福和自己责任的重大。根据党的指示，为了

爭取尽快地开工生产，我們老工人都积极地响应了党的号召，参加了恢复生产运动，每天都早来晚走，有时干到深夜，但是我們一点也不感到累。

經過六个多月的修复，这座小型軋鋼厂終於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正式开工生产了。这一天，我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說不出来的高兴。过去給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干活，流血、流汗，换来的是打罵、飢餓和家破人亡；今天是为自己干活，建設咱自己的国家，軋出每一根鋼材，都是为了祖国的建設，为咱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造幸福。軋鋼机开动了，一条火龙一样的鋼坯，順利地通过軋鋼机，厂房里响起一片欢呼声。这时，我想起了日本鬼子滾蛋时說过的話：“我們要走了，你們在这个地方种高粱吧！”現在讓他們来看看吧！赶走了帝国主义，我們也生产出鋼材来了。

在恢复生产时期，党加强了对工人階級的教育，送我去学政治、学文化，使我提高了階級觉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象我这样一个旧社会的放牛娃、半拉子、卖苦力的、被人看不起的人，如今当上了国家的主人，成了热工技术員，多次被評为厂和公司的先进生产者，还出席过省工会的會員代表大会。这些，过去我連做梦也沒有想到。

我們小型厂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劳动条件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对原有的陈旧、落后的設備进行了技术改造，加热工人扔掉了手工操作的大鈎子，实现了抽鋼操作机械化，

全厂机械化水平，由解放前的百分之六十二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二。

車間里安装了各种安全設備，加强了防暑降溫措施，建立了防热风扇、通风管、降溫水帘，工人上班有工作服。工厂为了照顾高溫操作工人，还发給高溫油、保健药費，工人和工人家屬享受着劳保待遇，党对工人的生活，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一九五〇年政府公布了婚姻法，我又把給人当童养媳的大女儿領回来啦！并供她念了书。現在我的大女儿已經在师范学校毕了业，当了人民教师。一九五三年經人介紹，我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全家过着幸福美滿的日子。

我在加热炉旁整整干了二十九个年头，拿今天和旧社会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一提起旧社会，就想起了辛酸的往事。俺不是貪吃偷懶的人，为什么凭这样身体，凭咱这双手，在旧社会就混不上一頓飽飯吃？为什么地主、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就不把咱当人看待？現在，我明白了，这就是階級剝削和压迫。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咱工人才当家做主人，我老藍才翻了身。

虽然我已經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是，我感到越活越年輕。今后，我要加倍努力工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以及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貢獻出我的毕生精力。

在苦难中搏斗

吉林省吉林火柴厂电工 王德财 口述

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四史”编写小组 整理

今年，我五十八岁了。在旧社会，我十四岁就进了工厂，当了二十七年的火柴工人，受尽了小鬼子、汉奸、把头的压榨。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张嘴就骂，举手就打。穷哥们受不住这股子窝囊气，常常起来和他们斗，但是，我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总也没有改变。一直到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咱们工人才真正翻了身，当了家呀！

闯关东

我老家在山东省鄆城县韩屯。我刚记事的时候，爹就离开家，下了关东。剩下娘、哥哥和我三个人，生活实在难熬。哥哥去给地主当半拉子，娘也给地主做零活。他们拚死拚活地干，也挣不来几个钱。哥哥只能带出一张嘴去，娘和我只好过着糠一顿、菜一顿的生活。

在我十四岁那年的正月，娘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

“德財，你也不小了，該慮点事了，眼下咱家要吃沒吃，要燒沒燒，你呆在家里，不是情等着餓死嗎？听說孔庄你孔宪宝大叔要下关东，你就和他一块找你爹去吧。若是那边好混，就来个信。”第二天，我娘东挪西借地給我湊了点盘費，我就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娘和哥哥，跟孔宪宝大叔闖了关东。

我爹在吉林市东关給一个姓何的官僚当炊事員。整天起早貪黑地侍候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和小姐們。可是，我却連何家的大門也进不去。我爹急得火窜头頂，为了給我張罗个住的地方，他不得不托亲靠友。最后，总算在“招财火柴公司”的大房子里，找到了一个姓刘的乡亲，叫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住。就这样，我白天就到处流浪，晚上就偷偷地溜回大房子，和刘大叔睡在一起。吃飯就更难了，有时候，我爹从老何家带出点来送給我，有时候我就到街上去要点吃的，过着半饥半飽的生活。每次我爹給我送飯时，看着我那个可伶样，总是伤心得流下泪来。

当 童 工

为了混口飯吃，我爹就托人給我找活干。經刘大叔帮忙，在巴虎門外姜家窑（磚窑）找了个压青灰的活干。当时，也不知道压青灰是干啥的，只想能有个吃飯的地方就行。我上工以后，老板就把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当成大人使用，让我把木炭用碾子压碎，再用篩子篩好装在麻袋里。一天得压七麻袋，不然就不让我吃飯。我每天得从早晨四点钟

一直压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压好七麻袋青灰。可是，老板却只给我半斤尖餅吃，这怎么能受得了呢？我在姜家窑只干了两个月，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啦，炭灰呛得我得了咳嗽病，瘦得皮包骨。我爹一看我被折磨到这步田地，就伤心地说：“德财，咱们不干了！”从此，我就离开了姜家窑。

离开姜家窑不久，我爹又托人把我介绍到西关“增昌火柴公司”，在工头朱明鑑手下当童工。公司的老板姓李，外号叫“李倒霉”。这个人特别恶，手里总是拿着一根木头棍子，在厂里，他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谁不顺眼，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他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如果哪个工人有了病或者他看谁不顺眼，就撵出工厂的大门。我刚进厂的时候，李倒霉分配我干零活。可没过几天，又让我去接枷子（枷子是夹着火柴杆沾药用的工具）。这个公司里共有两个药锅，有十二个沾药工人，两个接枷子的，每天要接四百八十車。那时候，沾药根本没有什么机器，工人得整天在药锅旁站着，烟熏火燎，一个个累得腰酸腿疼，熏得昏头脹脑，連飯都不想吃。老板还偏偏叫伙房用发霉的苞米面做窝头，連菜也沒有，实在吃不下去。越吃不下去，老板越乐，他攒下的錢也就越多，因为他每天都收我們每人五吊錢（是当时当地流通的一种紙币——官帖的单位）的伙食費呀！

过了几个月，老板突然对我亲热起来，笑着說：“王德财，你接枷子接得真快，活干得不錯，好好干哪！我李某亏待不了你呀。”誰知道，第二天老板就解雇了六个工人，让

我們六个人干十二个人的活。我一个人接枷子，一天还是得接四百八十車枷子，累得我整天直不起腰来。可是，工錢却一点也沒增加。

我在这里干了一年多，实在受不了这个罪，就想退厂。跟老板一說，就惹来了一頓臭罵，說让我一个人接枷子是器重我，不让我退厂。我想，这不是明明要把我累死嗎？不行，得跑，得离开这个鬼地方。

从增昌公司是跑出来了，但是跑到哪儿去呢？我不知不觉地来到东关，想找爹。可是，何家不让我进大門。我就站在門口等，直到太阳快落了的时候，还不見爹的影子，我只好离开了。到哪去呢？我也不知道。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一个叫尹凤楼的大叔，他跟我爹很要好，在兴业火鋸厂当炊事員，兴业火鋸厂离这儿又不远，咋不找他帮我想想办法呢？

經尹凤楼介紹，我就在兴业当上了拉鋸工。这个厂子是日本人开的，經理叫“大毛”，把头叫王明魁。干了几天，一看，这儿和“增昌火柴公司”并没有什么两样，工作每天照样是十三个小时，吃的也是发霉的杂合面，不管吃不吃，伙食費还是每人每天五吊錢。我在这儿干活，几乎天天得挨打，头上的大包一茬接一茬。在苦难中我熬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可是，他們硬說我装病，逼着我去干活，不几天，我就被折磨得起不来炕了，一躺就是一个多月。把头王明魁看我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就叫手下人把我抬到了一个廁所的后面，放在露天地上，一絲东西也不給盖。我跟把头說：“王

先生，我不能死，把我抬回去吧！”狠心的把头却对别人說：“你們听，他都說胡話了，不能好了！”我再三說明我不是說胡話，我不能死，要求把我抬回去，可是，王明魁連理都不理，硬是不准伙伴們往回抬我。爹爹听說这件事，就赶忙跑来，和尹凤楼一起去找工头，还是沒用。正在大伙无法可想的时候，邻近洗衣房工人孔宪仲（孔宪宝的弟弟），气愤地对在場工人說：“咱們都是穷哥們，沒家沒业的，一个人在外头不容易呀。王明魁今个这么整王德財，明个說不定还临到誰的头上呢？”大伙一听，觉得这話有道理，就一齐嚷嚷，要去找經理說理。王明魁怕把事情鬧大，只好答应把我抬回屋里。可是，紧接着他們又打了个坏主意，剛把我抬进屋，就告訴我爹說把我解雇了，让我爹赶快把我領走。

要 斗 爭

我十八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的四月間，爹又托孔宪宝和刘大叔把我介紹到吉林市“招财火柴公司”当工人。当时，日本鬼子的侵略势力，已經深入到我国东北地区来啦，到处都是什么日本租界呀，公司呀的。“招财火柴公司”就是日本人开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也和我住过的其他工厂一样，工人受尽了工头的折磨和欺凌。不一样的，就是工人們还得受日本鬼子的打罵和侮辱。我还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日本工头村上告訴我說：“經理佐藤經一要打球，你把球場用水洒一洒。”我就用自来水管澆球場。正在我澆

球場的時候，一個日本姑娘從我的身邊跑過去了，風一吹，濺到她身上幾滴水，她就破口大罵，一邊罵一邊跑回家去，告訴她父親三禿子。三禿子立即跑到球場來，抓住我的前脖領，就把我拽到他們家門口，硬逼我給她的姑娘下跪。一直跪了半個來時辰，三禿子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腳，把我攆了出來。受了這股窩囊氣，心里總覺得憋屈，就想找個辦法出氣，可是，總也沒得着機會。

一九二六年，一個外號叫“白大馬”的瑞典資本家，看到火柴工業有利可圖，便從佐藤經一手里高價收買了這座工廠。以後，又擴充建築，加緊剝削工人。

後來，日本工頭村上就在私下勾引我們，說上長春好，長春那家日本的火柴廠給的工錢多。於是，我們就跑到長春，入了“鐵北火柴公司”。後來，有不少同伴在吉林火柴廠呆不下去了，也都跑到了長春。其實，這里和吉林的火柴廠沒什麼兩樣，工作一樣累，工頭一樣狠。不一樣的就是這兒的工錢漲五吊，可是，伙食費也緊跟着漲了五吊。

我一聽說要漲伙食費，覺得挺怪。後來一看，伙食還和以前一樣，大伙很氣憤。有人說：“這不是把漲那五吊錢工錢又整回去啦嗎？”也有的說：“這一定是工頭孫文祥搞的鬼！”還有人說：“這五吊錢，咱說啥也不能交。”我說：“對，咱們不能讓他們欺侮慣了。可是，咱們得齊心，不交大伙都不交。若是咱們心不齊，你交他不交，有些弟兄就得受苦哇！”聽我這一說，大伙也都說：“對，抱起團來，跟

他干！要不，就沒有咱們工人的活路了！”

就在这天的中午，孙文祥拿着賬本收伙食費来了。我們就气愤地质問他：“孙头，伙食費为啥漲了五吊錢呢？”孙文祥說：“不用动气，不用动气，咱們这有賬，好說話。”我們說：“拿过来看看！”他以为我們不識字，看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就把賬递給了我，我接过賬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撕得粉碎。孙文祥見我撕了他的賬簿，老羞成怒，想要动手打我。这时，工友們也都圍了上来，我哪里肯示弱。孙文祥見势不妙，就順手操起一根扁担，另外一个姓徐的走狗也窜了上来。他們真象两条发了瘋的野狗，向我扑来。我一見他們来势很凶，就弯下腰，順手拔下了铁灶門，朝这两条瘋狗猛抛过去，正好打在了姓徐的前胸上，他的白布衫被血染成紫黑色。孙文祥一見姓徐的被打成了这个样子，吓得跑去給他的主子日本警备队挂电话。我一見闖了乱子，这铁北又是日本的租界地，若是讓他們抓住就算沒好了，就跟大伙說：“咱們闖了禍，不能在这里等死，得跑哇！”大伙說：“对，跑！”我們几十个人一口气就跑出了日本租界地。我們剛剛跑过铁路，日本鬼子的警車和摩托就追到铁路边。可是，当时他們还不敢越过铁路到租界地以外的地方来抓人。日本鬼子眼看我們跑过了铁路，又气又恼，也沒有别的办法，只好收兵了。当天晚上，我們找到住处，住了下来，可是，第二天一早，就发现同伴段继增沒有了。他上哪儿去了呢？沒有一個人知道。正在大伙着急的时候，遇

到一个从铁北来的人。他說在昨天夜里，火柴公司抓住了一个刺客，他带着刀子，摸进了工厂。但是，被日本鬼子发现了，把他抓起来，吊在树上。大伙說：这一定是段继增，咱們不能眼看着穷哥們死在日本鬼子手里，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說着說着，大伙就拿起木棍、铁管子，冲过了铁路，闖进了火柴公司。可巧，正赶上日本鬼子去吃飯，我們很順利地冲到了吊着段继增的那棵树下，把他解下来，抬着就跑。我們剛过铁路，日本警备队又追了上来，朝我們打枪。我們跑进了附近的一块白菜地，隱蔽起来。鬼子放了几声空枪之后，又退回了火柴公司。

在这以后，弟兄們就分开了。我跑到了敦化，入了黃泥河林場。

開 罢 工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又回到了吉林火柴厂。当时，日本鬼子靠着强大的政治、軍事压力，从瑞典人手中收回了这座火柴厂，并改名为“磷寸株式会社”。我还是在火鋸上干活，当修理工。

这个时候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小鬼子对咱們工人更凶狠了，劳动時間更长了，每天得干十四、五个小时以上；工錢也更少了，就是你拼死拼活地干，也还当不住挨餓、受冻；成百的装盒女工、童工，挤在几間不見阳光的大房子里，坐在凉炕上装火柴，根本沒有劳动保护品，还强行克扣工人的

工資，每個月都要從我們工人的工資中扣去幾元錢，說是什麼“儲蓄”。錢是扣了不少，可是，卻不見給我們利息，也不還本。這就是變着法扣我們的工錢！

鬼子對工人的壓迫越深重，工人們不甘受壓迫的決心也就越來越大。

一九四一年年初，我們火鋸上的工友齊成之的母親得了重病，想吃點面湯。可那時候哪個工人家裏能有面呢？我知道這件事之後，就去找趙工頭，他說行。我跟齊成之一說，齊成之馬上就去找他。可他却說：“哪有白面給你呀？”齊成之沒辦法，又回來找我。我一聽，氣就不打一處來，我說：“你等着，我去找他！”吃午飯的時候，我就琢磨，為什麼鬼子、工頭整天吃雞、鴨、魚、肉，大米、白面，工人有病想喝點面湯都不行呢？想來想去，覺得再找他也沒用了，倒不如給他點顏色看看，讓他知道知道我們工人的厲害。午飯後一上班，我就對火鋸上的工人說：“弟兄們，鬼子把頭們整天吃大米、白面，可我們什麼也吃不到，就連病人他們也不給吃。咱們能這樣忍受下去嗎？”正在這個時候，趙工頭大搖大擺地走過來了，一看我們都集在一塊啦，就問：“你們想干啥？”我說：“我問你，你為什麼天天吃白面？你怎么發的財？”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就是吃你們的白面，靠你們發的財！怎麼樣？”一聽這句話，大伙都氣壞了，齊聲喊道：“咱們不干了！”一百八十多人，撂下火鋸上的活計，就不干了。並提出要求，工人每人每月也要發給

五斤白面，一斤豆油。

火鋸掌柜的小鬼子大石，一看火鋸停了，着了慌，赶忙去找赵工头。赵工头告訴他是我領头鬧的事。他就派赵工头把我和李忠田叫到柜房。我刚一进柜房，工厂总管鬼子石村就用威胁的口吻說：“你的領头的不干，脑袋的沒有！”当时，我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并提出我們的要求。鬼子一看火鋸上的活計技术性也比較强，我們几天不干活，整个工厂就得停工。再說当时火鋸上还有不少活是給“关东軍”加工軍用品，若是几天不干，他們交不了貨也吃不消啊！所以，他們只得來軟的，答应了我們的要求。第二天一早，厂內就貼出告示：三天內，发給每个工人五斤白面、一斤豆油，每人每月給五捆燒柴。这次罢工胜利了，我們都很痛快。

开始发柴禾了。我和弟兄們又核計，小鬼子只說每人每月給五捆，可是他沒有說是多大捆，咱們就給他大大地捆哪！小鬼子眼睜睜地看着我們几个人抬一大捆燒柴，也沒啥可說的。第二个月，小鬼子做了一个铁圓圈，每捆柴都不能比这个圓圈粗。可是，小鬼子却又忘了規定一捆柴应该捆多长了，我們就把柴禾捆捆了一丈多长，小鬼子还是沒有办法。直到第三个月，小鬼子不让工人自己捆了，他們不得不先雇人把柴禾捆好了，再分給我們。

又过了两个月，赵工头突然对我說，日本人把分燒柴的規矩取消了，下个月，不給大伙发柴禾了。只每月单独給你一吨好煤，或者補助二十元錢。我一听，这是要收买我，就

說：“要給都給，單給我王德財一個人，我不要！”趙工頭說：“別人不能給！”我說：“不給，我們就不干了！”

东 方 紅

离开“磷寸株式会社”的第二天，我就进了“江北火鋸”第二部当火鋸修理工。过了几个月，我就到“磷寸株式会社”找管賬的馮瑞章要錢，就是我在這個廠子的时候，他們每个月从我的工資里扣的“儲蓄”錢。到我离开工厂的时候，已經存了

伪币一百二十五元啦。見到了馮瑞章之后，我說：

“馮先生，我取儲蓄錢来啦。”这个家伙知道我沒儿沒女，可他却說：“錢現在不給，等你死了，让你的后人來取，当安葬費吧！”我气憤地质問他：

“若是沒儿沒女呢？”

“那就归官了。”一听这話，我更来气了。这不是明着搶嗎，我怎么能答应呢？馮瑞章一看賴不过去了，就給我开了白条子。

并告訴我說：“这条子不



能取錢，可以拿出去賣。”我問他：“這麼一張白紙條子，誰要呢？”馮瑞章順手指了一下坐在他對面的翻譯張曉更。張曉更皮笑肉不笑地說：“賣給我吧，給你七十塊錢。”什麼？一百二十五元錢的儲蓄，花七十元錢就想買去！我寧可撕掉它。想想想想，我就把這張條子撕得粉碎。張曉更說：“唉呀，你怎扯了，這一百多塊錢夠你掙多長時間啦！”我說：“不要了！”轉身就往外走，一邊走一邊想：“总有一天要找你們這些吸血鬼算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小鬼子垮台了。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堅持的抗日戰爭勝利了。我想，我要錢的時候到了，於是我就大搖大擺地走進了火柴廠（磷寸株式會社的牌子摘掉了）的大門，上了辦公樓，找到了馮瑞章。頭一句話就說：“馮先生，到我要錢的時候了！給錢吧！”馮瑞章滿臉陪笑：“咱哥們相處多少年了，誰跟誰，別上火，有話好說，有話好說。趙會計，給老王拿錢。”趙會計拿着鑰匙去開保險櫃。就在這時候，馮瑞章趁我不注意的時候溜走了。趙會計打開保險櫃回頭一看，馮瑞章沒了，就又把保險櫃鎖上了。他說：“馮瑞章沒告訴我給你多少錢，我怎麼給呀？”我說：“好小子，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找他去！”趙會計看我氣憤的樣子，怕出事，就叫我先等等，他去找。不一會他就回來了，從保險櫃里給我取出了一百八十元錢。我接過錢來，心眼里痛快極了：“趙會計，我今個不是來要錢的，就要出出這口冤枉氣呀！”趙會計看我沒有要

走的意思，就說：“我明白，出了这口气，你就請回吧！”

我說，“不走啦！”第二天我又在火柴厂上了班。

在解放軍进入吉林之前，过去騎在人民头上的伪翻譯、職員、工头等，成立了什么管理委員會，由馮瑞章担任什么委員長，妄图繼續压迫和剝削工人。一九四五年冬，解放軍来吉林之后，我和安煥成、王明浩、董彥文等三十多个老工人联名写信給市总工会，要求他們替工人作主。沈市长当即亲自来到工厂，和工人們一起解散了管理委員會，我們工人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工厂的大权，安煥成被选为厂长，王明浩当了工会会长，把火柴厂改名为“光复火柴厂”。火柴厂很快就全面开工，正式投入生产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人民解放軍为了更彻底地消灭敌人，做了战略性的撤退。撤退之后，火柴厂就来了“新厂长”。原先的所謂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又都官复原职了。他們对工人更苛刻了。

当时，我在变电所当电工。馮瑞章对我恨之入骨，想把我解雇，又雇不着电工，因此，他就千方百計地刁难我。可我也不怕他。有一天，我买了两个小猪装在麻袋里，从馮瑞章家門前路过。馮瑞章正在刷牙，小猪也在麻袋里乱蹦，我指桑罵槐地說：“早晚有一天，我得杀了你！”馮瑞章真的怕我杀他，就想收买我。有一天，他叫我去給他修理澡塘子。我到他家一看，哪里是什么澡塘子坏了。他妹妹硬把我拉进屋里，我一看摆了一桌子酒席。我是好喝酒，可这酒我不能

喝。馮瑞章跟我說了許多好話，我一句也沒聽進去。我在想，等解放軍回來再跟你算賬！

一九四七年新年的時候，廠方為了討好工人，也大擺酒席，把我們一些老工人和被他們解雇的工人請了去。可我們不吃這一套，當場我們就質問“新廠長”：“你們沒錢給工人開支，哪來的錢大吃大喝？”並指責他隨便解雇工人。

“新廠長”推脫說他根本不知道。我們說：“你別裝蒜，解雇工人你不知道誰知道！他們沒有生活出路怎麼辦？”他被我們問得閉口無言，只好答應讓被解雇的工人回廠上工。

一九四八年春天，解放軍趕走了國民黨反動派，重新進駐吉林市。我們火柴工人徹底翻身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十幾年來，我沒有忘記舊社會的苦難生活，也沒有忘記工人弟兄們在苦難中進行的搏鬥。但是，我懂得了我們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毛主席的指引，有勁也使不到正地方。自發的鬥爭，最多只能暫時得到一點經濟利益；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有團結起來，跟着黨，進行自覺的革命鬥爭，才能擺脫被剝削被奴役的地位。過去，和反動派、階級敵人鬥爭的時候是這樣；今天，搞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三大革命的時候也是這樣。我一定牢記階級苦，永遠聽黨的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當一個好黨員、好工人。

憤怒的火花

——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老焊工丁义家史

柳连比 整理

丁义原籍是山东省諸城县大丁家村。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靠耍木匠手艺为生。一八九五年前后，流落到沈阳。一年后，丁义的祖父死去了。丁义的父亲找到一个木匠鋪吃劳金，每月只掙十二吊錢，一家人过着不得温飽的苦日子。

几年后，丁义的哥哥和丁义先后出生了。添了人，家里的生活就更困难了。沒有办法，丁义的母亲只好抱着丁义，領着他的哥哥，成天出去討飯。

一九二一年，丁义十五岁时，他父亲由于常年給資本家卖命，积劳成疾病倒了。一家人生活无着，就把祖輩傳下来的鑿、凿、斧、鋸等卖掉，换点糠粮来度命。后来，东西卖光了，丁义的母亲沒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得去找木鋪的老板借錢。木鋪老板把眼睛一瞪說：“你还来借錢？名字都勾掉了。”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雷，气得丁义的母亲眼前一片昏花，踉踉蹌蹌地走回家来。丁义的父亲看到妻子回来的情况，

心里全明白了。他連气帶病，把仇恨埋在心里，离开了人間。

学徒的苦难

丁义的父亲死后，母亲托人把丁义送到沈阳东关复兴铁工厂去学徒。

这个工厂有十几个劳金和十几个徒工。老板外号叫“刘大眼”，是个貪得无厌的家伙。他从来不雇用做飯的师傅，做飯的活，全由新来的徒工干。丁义一进厂也照样是做飯、打杂。稍不如老板的意，就得挨打受罵。有一次，丁义把粥煮的非常好吃，刘大眼知道了，用藤棍把丁义暴打了一頓。还假惺惺地对工人說：“伙計們吃不飽，干不出活来，都怪你沒把飯做好。”其实他是怕工人吃飽的。丁义每次做飯，都由刘大眼老婆量米，她量米卡得很紧。伙計們常常吃不飽，丁义就更苦了，他后吃飯，沒有剩飯就得挨餓。他学了三年徒，整整做了两年飯。第三年来了个新徒工，他才离开伙房。

三年学徒期滿，丁义去問刘大眼：“我該滿徒了吧？”刘大眼說：“还得两天，你有病耽誤的工得补上。”这样，又逼丁义干了十多天。丁义滿徒后，本应一个月掙十元錢，刘大眼借口他是本厂出徒的，每月只給两元錢。丁义为了摆脱这种殘酷的剝削，干了四个月后，就离开了这个厂。

工头的勒索

一九二五年，丁义“考”进了軍閥开办的“沈阳兵工

厂”。这个工厂有上万工人，专做枪支弹药。

說是“考”，其实是“买”。工人报名时，每人得填写一份履历表，装在一个大信封里。誰要是在里边装上錢，就十拿九穩考上。丁义沒有錢，托人求情，答应开餉后送礼請客，才勉强考上了，月薪为十元。

丁义本来学的是鉗工，可是到了这个工厂以后，王工头硬叫他去当鍋炉工。鍋炉房有个保修組，保修組里有做燒焊的，丁义就利用推煤間隙時間，給修理工当下手，在帮助他們焊活中，他学会了焊工手艺。

当丁义剛領到第一个月的工薪时，这个工厂的一所所长肖福林和王工头就盯上来了。王工头对丁义說：“老丁，答应請客，走吧，到‘东发园’去。”丁义无奈，只得咬着牙去了。肖福林和大小工头去了七个。这些小子大吃二喝一頓，一下子花去了丁义半月的餉錢。

每到年节，所长、工头就逼着工人給他們送礼。丁义进厂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几天，王工头就对丁义說：“快过年了，咱們得到肖所长家去串个門，你去不去？”丁义明知道又是勒大脖子，心里不願去，可又怕得罪这些小子，打了飯碗子，只好答应去。到了肖福林家，王工头領头拿五元，有的拿四元、三元，最少的拿两元，丁义拿了兩元。肖福林还假惺惺地說：“拿錢干什么，大家都带着吧。”他嘴里这么說，錢却收下了。接着，又話題一轉問：“怎么，大家还要到王工头家去串門嗎？”肖福林这么一說，工人又得去給王

工头送礼。丁义在这个厂只干了二年多，除了年节外，肖福林还办了三次“喜事”。头一年给他爹办寿，第二年给他妈办寿，第三年又给他的孩子过满月，再加上其他大小工头的“喜事”，一年也得让他们变相剥削去不少钱。

工人白天在工厂干一天活，下班还得给工头干家里的活。锅炉房的工头刘玉春，一连几天都叫丁义往他家里送刨花子。从工厂到他家，再从他家回到丁义家，要走八九里路。丁义实在忍受不了，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丁义在装刨花的麻袋里装上了木板，故意叫门岗检查，结果扁担、麻袋都被扣下了。刘玉春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处处找丁义的小脚。一天，丁义正在推煤，刘玉春拦住煤车，就凶神恶煞地说：“今天得罚你两个工。”丁义说：“我没有错，凭什么罚我？”那小子更是力竭声嘶地喊：“你推煤把煤撒了一地。”丁义知道这是找斜碴，说了声“随你的便吧！”就转身走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丁义一连被罚了三次工。这些被扣的工钱，都揣入了所长和工头的腰包。

在这个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的工厂里，丁义实在忍无可忍了，便在一九二七年春离开了这里。

压迫与反抗

丁义离开兵工厂以后，他串遍了沈阳东关的大街小巷，在这里打短，到那里卖工。“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有一位叫李忠福的老乡，看丁义老实能干，就把女儿许给了他。丁

义成了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的殖民统治一年比一年残酷，今天来要“火灾保险费”，明天又是什么“献纳金”，逼得丁义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就是在这困难的时候，丁义的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由于大人吃不饱，身体不好，孩子在娘胎里营养不良，生下来不到满月就死了。第二年又生个儿子，刚到六个月，因为没奶吃又饿死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丁义进了铁西“日满钢材株式会社”。

这个工厂专门加工承制铁窗、铁门和铁路桥梁。丁义在窗部当焊工。当时鬼子看焊工干活是多是少，只看原料用了多少。一天，刚要下班，窗部的工头长田来检查，他翘起仁丹胡，把眼珠子一白楞，看看丁义使用的氧气罐上的风表，又看看丁义，说：“你的，七十磅的不行，一百磅的给。”

（意思是说丁义只用了七十磅氧气，太少了，应该用完一百磅）上去就踢了丁义一脚，接着又是几个大嘴巴子。丁义的脸上立刻出现了几道通红的魔爪印子。第二天，丁义背着鬼子就把氧气白白地放掉了二百磅。又有一次，日本鬼子叫焊工组的工人去焊铁架子，并规定每人一天要使用完四十斤焊条。按正常操作，这些焊条一个人两天也用不完。丁义记住了上次的教训，干活时就扔的扔、埋的埋。不巧，这事被长田发现了，把丁义暴打了一顿。打这以后，鬼子每天下班前都要来操作现场往回收焊条头。丁义又想出了新的对付鬼子

的办法，到不收焊条头的铆工组把他們用过的焊条头拣回来用火燎一燎，拿去交差。

丁义忍欺受辱，过一天象一年，月月盼发餉，月月沒指望。一到发餉，一大堆捐稅都跟上来了。“生命保險費”一元，“所得稅”十分之一，“修铁路稅”一元……丁义一天掙七角，去了这些捐稅和克扣，一个月仅能剩下十三、四元錢。为了节约度命，丁义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得从东关的家走到铁西，足有二十五里路，要走两小时，夏天連鞋都穿不起。吃的，主要是豆餅和糠麸，多么难啊！

丁义恨透了日本鬼子，要退厂。可是鬼子見他有油可榨，不让退，把“劳工证”沒收了，領粮的“通賬”也不給，逼得丁义沒有办法，只得留在厂里。

后来，日本鬼子又把他們的人派到中国工人当中来，一边干活，一边加紧監視着中国工人。一天，丁义正在电焊组干活，厂里派来一个小鬼子，名叫一田。他一来，就把五个工人分成两个组，他領两个人一组，叫两组对比着干。他干多少，强逼着别人也得干多少。工人直直腰，他就臭罵一頓。他自己使一台点焊机，天天早来，上班前銼焊嘴子，修整工具。丁义想，不把这小子整走，工人就得受欺压。有一天，丁义特地起个早来到工厂，乘鬼子还没来，他就把小鬼子使用的那台点焊机上的两根电线的头倒过来，躲到一边去看动静。小鬼子进来以后，拿起銼刀刚要銼焊嘴子，立刻“啊”了一声，就粘在点焊机上不能动了。丁义在一边看这小子过

电过的差不多了，才把电門拉开断了电，这小子又一个倒仰，后脑勺子正好摔到一块三角铁上，血順着脑袋流下来。丁义又赶紧把电綫正过来，这才装出惊慌的样子喊了几声“快救人呀！”长田跑过来一看，气得哇啦哇啦怪叫。丁义忙編說了一套救一田的經過。长田也找不到怀疑丁义的证据，就相信了，还說：“你的頂好。”从此以后，一田再也没有到电焊組来。

又过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保修部的切断机上的脚閘坏了，叫丁义去燒焊。丁义一看，紧貼机器旁边有个水泥池子，里边装着机油。他心里暗暗高兴，又来机会了。机油不易点着，他就把一些擦机器的碎布沾滿了洗油，装着擦机器，还故意对监工的鬼子說：“得卸下来焊，要不有危險。”鬼子知道机油着不了火，所以，他听了丁义的話，认为丁义要磨洋工，就罵了丁义一句。“庫啦，快快的干，沒有关系。”这下子，丁义更有借口了，趁鬼子一轉身的工夫，就把沾滿洗油的碎布塞在机器底下，打开焊火，不一会儿，机器底下的烟火就一齐窜起来了。丁义一喊救火，鬼子就慌了神，工人們都七手八脚地往机器里扔砂子，还用装灭火液的瓶子往机器上砸，把机器埋了大半截。厂部的鬼子找丁义去审問，丁义把原因推到监工的鬼子身上，那个监工的鬼子挨了一頓打。丁义看看机器，又看看鬼子，心里高兴极了，工人們也个个觉得心里痛快。

在苦難中斗争

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小鬼子投降了，紧接着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劳动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九四七年十月，丁义托朋友老沈在“沈阳第四汽车修配厂”找到活做。到了工厂以后才知道，这个工厂外边挂的牌子是汽车修配厂，里边却是做冲锋枪、六〇炮的。厂里的总管事是一个蒋匪上校军官，外号叫关大炮。他腰里别着美国枪，到处乱闖，見誰不順眼举手就打。

丁义一进厂，就在焊工組做梯形的铁架子。他問早来的工友：“这玩艺儿干啥用？”工友們小声說：“是往飞机上运东西用的铁架子。”“說不定这个厂还得迁走呢，还說要咱們也跟着去。誰跟他們去受罪……”丁义听到耳里，記在心里，也照着那些老工人的办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铁架子总是焊不好，关大炮急得团团轉，天天来催逼。工人們不是說图紙有問題，就是說材料不好。一直拖到年底也沒做出来。

后来，丁义又被調去焊炮盘。开头，一人一天焊两三个，关大炮硬要每人一天焊五个。工人都不願干，胡弄胡弄就交貨。出厂前一試驗，很多都有裂縫。关大炮来到焊工組追查原因，丁义說：“材料不好。”关大炮把眼睛一瞪說：“一样的鋼板，一块下料，为什么有的好的有的坏？”“一个炉的鋼水还有先淌后淌出来的呢！”丁义爭辯着。关大炮凶

神惡煞地冲着丁义喊着：“就你他媽心眼多，老強調理由。”后来，关大炮又找借口把丁义暴打了一頓，还揚言要枪毙他。

那些国民党反动派只要工人拚命干活，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不但不供应工人的粮食，連糠麸也不給了。丁义一个月掙三千万元，只能买到三十斤高粱米。后来卖粮的就不点錢了，干脆一斤票子一斤粮。丁义扛回两袋票子，換回的粮食仅能盖上袋子底。一家人怎么活呢？丁义的母亲餓得病倒了，七岁的女儿也病倒在炕上。丁义的老婆瘦得皮包骨，还得成天出去要飯。丁义每天出工干活，只带一个空飯盒，午間到野外采点野菜填肚子，餓得直打晃。

一天，丁义下班回家，病在炕上的女儿餓得伸手向他要半張煎餅吃。可是兜里分文沒有，半張煎餅要伪币五万元錢，怎么买呀！丁义的妻子走了几个煎餅鋪也沒賒来。丁义的心情真是难过极了。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間，国民党反动派临近垮台的时候，对工人的压榨更狠毒了。厂內汽車庫底下設有水牢，另外还有禁閉室，水牢和禁閉室里都关押着許多工人。車工赵景春因为車廢了炮筒，就被关押在禁閉室里。

丁义这时在淬火組，为机枪彈簧淬火。一炉炉彈簧，淬出来不是軟就是硬，沒有一个好使的。气的关大炮要把丁义、老沈等几个工人押起来。工人一口咬定材料不好。关大炮沒办法，又調来一个技师，外号叫“韓嗑吧”。他一来，

工人就商量好了对策，叫他試不成。工人們把材料放到炉里后，“韓嗑吧”就把看火头的試棒插到炉里，等他一轉身，工人們就把試棒換了。材料燒过火了，一淬火，全是廢品。又試一炉，他一轉身，工人們又把原来的試棒換进去。材料燒得不到火头，又全是廢品。急得“韓嗑吧”滿头大汗，找不出原因，只好蔣退了。

眼看解放軍要进城了，工厂逼着工人拆卸机器。工人們把螺絲卸下来又擰上，擰上又卸下来，七八天也沒卸完一台机器。包装的木匠們不是磨斧头，就是鋸鋸，故意拖延。一台机器還沒运走，那些国民党反动派就拎着提包夹着尾巴从工厂的后門跑掉了。

当 家 做 主 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了。紧接着就发給工人粮食。丁义乐顛顛地把粮食扛回家，全家人都高兴极了。躺在炕上的丁媽媽立刻坐起来，就連有病的女儿，臉上也露出了笑容。当香噴噴的热飯端上来的时候，丁义妻子眼含热泪說：“多少年来，这是咱家吃的头一頓飽飯哪！”丁义激动地說：“共产党、毛主席是咱的救命恩人，要是再晚来几天，咱全家都得餓死。”

工厂在加紧恢复生产，丁义忙着修房盖，扫厂房，擦洗机器。現在是为咱劳动人民自己干活了，丁义越干越有勁。生产开始了，工厂号召工人搜集廢料。丁义小組一天就搜集

七八車、十来車。有一次，丁义小組从廢料堆里，找到了一批破槍和彈簧。丁义高兴极了，他赶紧跑去对領導說：“这回可有办法支援前方狠狠打国民党反动派了。”当領導知道他要修理这批槍支的心情后，問他：“有把握修理好嗎？”丁义滿有信心地回答：“我坚决保证把这批槍修好。”当領導上同意他的請求后，丁义和小組工人們立刻动起手来，又擦又洗，丁义亲自給彈簧淬火。一大批槍修好了，經過实彈試驗，完全合格。丁义立了一等功。一九四九年三月，丁义被选为厂劳动模范。在全厂职工庆功大会上，厂长亲自把一朵大紅花戴在丁义胸前，丁义这时臉脹得紅紅的，嘴唇顫动着，好象心里头有千言万語要說，可是却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几个月后，丁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〇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丁义随同工厂来到了齐齐哈尔。

丁义十几年来如一日，把一顆赤誠的心献給了党的事业。在生产技术上，他不断革新，不断前进。一九五六年，他被提为工程师。現在他是这个工厂的党委委員。他两次被評为东北地区的劳动模范，連續被評为省市劳动模范。当人們提到他这些荣誉的时候，他总是笑着說：“哪有我自己的成績，那都是党的功劳。”丁义今年五十八岁，按劳保条例規定，三年前他就可以退休了，可他却說：“我現在还年輕，还能为社会社会主义干几年。就是将来我老了，身子退休，思想也永远不能退休啊！”

苦 難 的 童 年

沈阳第一毛紡織厂工人 刘蓮子 口述

吳秀琴 整理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威海县。爸爸是漁民，一輩子受尽漁霸的压榨和欺侮。一次，出海遇到风暴，連人帶船翻到海里，沒有再回来。父亲死后四个月，我才出生。为了一家老小，大哥只好走上父亲的路子去打魚，白天黑夜干，一家人也吃不上一頓飽飯。一九三六年，一个大雷雨天，大哥不忍心看着一家人挨餓，冒着暴雨去打魚。沒想到他走到碼頭，叫电过死了。大哥死后，一家人生活的担子便落到二哥身上。那时二哥年紀小，体格弱，成天打不上来魚。弄不到吃的不说，漁霸还逼着繳船租、网租。二哥又急又气，心火上攻，鬧起眼睛来，不久两眼便都瞎了。

一九四一年，日子过不下去了，媽媽万般无奈，看人家闖关东，也让二姐、三姐跟一个乡亲到沈阳(当时叫奉天)来住厂子。二哥、小哥和我便跟着媽媽成天到野地去挖野菜。忍饥挨餓过了一年，在威海实在混不下去了，媽媽囑咐二哥

先在家等信，便領着小哥和我，到沈阳来找我的两个姐姐。

我們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麻袋厂（当时叫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到了麻袋厂，媽媽向把門的說了不少好話，才把三姐找了出來。这时我們才知道二姐已和外厂一个工人結了婚，到大連去了。

三姐看見我們，先是欢喜，随着又发起愁来，低声說：“你們怎么也到这个陷人坑来啦！”

不用三姐細說，一看三姐的枯黃瘦臉，我們就知道麻袋厂是个什么地方了。但是，我們翻山过海来到沈阳，投亲无路，求借无門，明知是个火坑也得瞪眼往里跳哇！媽和三姐核計了再三，还是想法都进了麻袋厂。那年我才八岁，站起来比桌子高一点，就开始了活地獄一样的童工生活。

麻袋厂，是日本資本家开的。据說那个“老总管”除了沈阳外，还經營辽阳、大連的两处麻袋厂，有一整套盘剥工人的設施。在每个車間里，除了大金杠、窄金杠、紅杠、黃杠（区分工头等級的标志）等工头外，还有不少小头子、小腿子。他們勾結在一起，終朝每日帮助“老总管”压榨工人。那时的机器，也非常簡單，什么皮帶罩、牙輪罩、保护栏杆等安全設備，全都沒有，經常发生工伤事故。有的工人被攪进机器里，丧了性命。有的落了殘疾，不能繼續給資本家卖命，就被一脚踢开，衣食无着，死于街头。工人每天上班，提心吊胆，真象进了地獄一样。

我还清楚地記得头一天上工的情景，一个滿臉橫肉的大

胖子，領着我走过一座座大房子。另外一个中等个男人，帶着我进了車間。一进門，轰隆轰隆的机器声，震得我头昏脑脹，屋里一股腥臭味，熏得我直想吐。我一眼看見三个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小孩，正在吃力地往机器上举大綫轆轤。我越看越害怕，正在发楞，那中等个的男人大声罵我：“你是死人？站着干啥？好好跟他們一起干！”我这时偷偷瞅了瞅他，这个人大約三十四五岁，滿臉連鬚胡子，戴頂黄色的大沿帽，上面有两道紅杠，穿一双皮靴子，手里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藤棍。他两眼狠盯着我，象要吃人似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們的工头，名叫王国晨，大家都管他叫“老王八”。工人还在背后編了不少順口溜咒罵他。

我們小童工和成年人一样，每天干十二小时活，輪上夜班，照样干通宵，干完活，累得腰痠腿痛，头昏眼花。有时，下班后，我累得渾身发軟，連回宿舍的勁都沒有了。实在支持不了，我就爬到車間的廢麻秧子箱里迷一会，让狗工头发现后，就少不了挨一頓沒头沒臉的毒打。所以，好心的工友看見后，就把我叫醒，扶我回宿舍。因为活累，又吃不飽、睡不好，白天总是迷迷糊糊的。有一次，王国晨让我摆麻穗子，这麻穗子，一捆少說也有二十斤。我从机器上往下拿够不着，一下子都弄散了。我怕王国晨看見，急忙蹲下收拾，誰知叫王国晨看見了，他恶狠似地扑过来，照我后腰狠狠就是一脚。我一个跟头跌出去老远，脑袋撞到磅秤上。我实在疼急了，狠狠地罵了一句。童工罵工头这还了得！王国

晨举起手中的藤子棍，象雨点一般往我的头上打来。幸亏几个年岁大的工友赶来，才把王国晨拦住了。从此，打罵总是不离我的身。头上鼓满肿疱，身上尽是鞭痕，睡觉时，怎么躺也睡不稳。白天受了气挨了打，晚上见了媽媽就吐吐苦水。媽媽含着眼泪一边听，一边撫摸我的头，我常常哭着說着在媽媽怀里睡着了。后来，我发现媽媽、三姐、小哥和所有的工人臉上手上都带伤，才明白原来他們也一样挨打受气，我就再不向媽媽訴苦了，眼泪直往肚子里咽。

挨打受气是为了吃碗飯，可是資本家給我們吃些什么呢？一年到头是橡子面、霉高粱米、臭豆餅、烂倭瓜。就是这些，也吃不飽。有时，喝的只是些刷鍋水似的豆餅湯，上面还浮着一层黑机器油，舀一碗閉着眼睛灌进肚子，比不吃还难受。

我們住的“号子”（宿舍），夏天屋小人挤，气味难聞；冬天象个冰窖，墙上挂滿冰霜。躺在冰凉的磚炕上，我和媽媽、三姐三人合盖一条破棉被，冻得渾身直打哆嗦。每天起床，腿脚都冻僵了，不能迈步，要扶着炕沿溜一会才緩过来。从那时起，我就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如果不是解放了，我就得瘫痪。說到穿衣，那更別提了。不但做不上一件新衣，旧衣服破了也沒有布补，只好用麻綫把窟窿扎上，看着真揪心。

拚死拚活地干一个月，資本家扣去“猪狗飯”錢和不如“鸡窩”的“号子”錢，只发給一元錢，就算一个月的工錢了。因为吃不飽，整天餓得心发慌，只好拿这个錢，偷偷买几碗豆腐渣充充饥。可是，狗工头对这几个血汗錢也不放

过。开始，我每月能領一元錢，后来，只能領到九角、八角、七角……一直降到五角。我挺奇怪：为什么不給长工資，反而月月降起工資来？就問工头王国晨，他瞪着狼眼蛮橫地說：

“怎么，你还嫌錢少？你这么大点个东西能干个啥？不开除你，就是好事了！”显然，那儿角錢是叫他克扣去了。我心想，和这帮黑心狼有什么道理可讲！从此再也沒找他。年岁大的工人不平地議論着：“蓮子虽然是个孩子，可是活真沒少干啊！这些沒人性的家伙，刮油都刮到骨髓里去了。”

一家人落到这般地步，万恶的旧社会还不放过我們，灾禍又一桩接一桩落到我們的头上。

有一天，我和媽媽剛下夜班，在炕上躺着餓得睡不着，忽然听見“号子”外面吵吵嚷嚷，有人說：“找关里来的老刘太太！”媽媽一骨碌爬起来，叨咕着：“大概是你二哥来啦！”我和媽媽急忙赶到厂門。只見那儿圍了一群人，“舍監”正用帶棱的三角皮帶，往一个人身上一边抽一边罵：

“瞎子不去死，跑这来找魂！”我的眼睛尖，一眼便看出那个被打的是我二哥。我們从二哥的口中知道，二哥在威海活不下去了，随一个乡亲到沈阳来找我們。可是麻袋厂的“舍監”不給找，还辱罵二哥。二哥气极了，頂了“舍監”几句，結果招来一頓打。二哥一边讲，我和媽一边伤心地流泪。站在一旁的众工友，也不住地为二哥鳴不平。狗“舍監”根本不理碴，硬把二哥赶出厂外，說啥也不让在厂子里留宿。二哥只好毫无目的地又走了。

几天后，二哥又来了一次。这回他更不象人样了，面黄肌瘦，滿身是泥。他摸着媽媽的手說：“娘，我再來让你看看。我是沒有活路了，別惦記我了，好好养活弟弟妹妹吧！”媽媽劝他說，“別說瞎話，慢慢就有办法啦。”二哥摇摇头說：

“我再不來啦，我抗不了这里的那帮恶狠！”原来自从第一次二哥來和“舍監”作下仇口，每次再來，“舍監”就百般刁难他，不是不給我人，就是辱罵。二哥是个有志气的人，他不願受这份窩囊气，也不让媽媽跟他累心。他說完，又把我拉到跟前，摸摸我的臉，然后扭轉身，拄着棍，一步一探地走远了。媽媽难过地站在那望着。二哥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她还站着不动……。



二哥走后不久，听一位家在厂外住的老工人說，臭水沟里死了个瞎子，旁边还有根棍。媽媽一打听臉型、穿戴，知道那是二哥。她当时难过得一句話也沒說。后来，常常坐着发呆。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一九四四年天剛轉冷，我們正在車間里干活，忽然聞到一股烟火味，大家吵吵嚷嚷：“可能

又失火了！”

正在这工夫，忽然小哥慌慌张张地撞进来冲我喊：“蓮子，軟麻車間着火了，咱娘熏死啦。”我急得喊了一声“娘……”扔下活就跟小哥跑。可是賊工头一把拽住我說：“死个老太婆，有啥了不起的，你去了，活誰干？”工头說啥不让我去。得亏众工友帮助我，趁工头不注意我偷着溜走了。

我赶到的时候，媽媽已經被工人抬到車間外边。她的头发燒焦了一半，衣服也燒了个角，臉鉄青的，眼睛半睜半閉。我和三姐、小哥喊娘叫媽，媽媽一动也不动。日本鬼子領着工头来了，直勁攆我們走，說在那影响大家干活。我又气又恨，心想，狗工头心太狠了，亲娘的命都沒有了，我們也豁出来了。他們怎么攆，我們三人还是抱着媽媽哭叫不放。幸亏一位好心的老大爷，告訴我們，媽媽也兴叫烟憋住了，放放烟可能緩过来气。几个人把媽媽抬到空气流通的地方，掰开她的嘴，捏捏脖子，果然一团团黄烟冲出来。足有半个钟点，媽媽才緩过气来。可是她神志老不清醒，好几天不認識人，总比划着喊：“火，火！”

后来，我才知道，着火时，大家都往外跑，媽媽剛跑到門口，工头来了，他怕火蔓延到别的車間，“砰砰”把車間的門都关上了，硬把媽媽关到里边。軟麻車間里滿屋黑烟，媽媽推推这扇門，晃晃那扇門，大声喊：“快開門，还有人哪！”“開門，放我出去啊！”工人也要求工头開門。心比蛇还毒的工头，用鞭子抽散人群，恶狠狠地說：“死个老太

婆有啥？火燒到別的車間你們担得起？”媽媽把車間的門晃遍了，哭喊聲越來越小了，後來沒有了聲息。等工頭一離地方，大伙不顧一切地打開門，只見我的媽媽栽倒在門旁。

媽媽不能上工，“舍監”不讓捎吃的，我和小哥省下自己分的窩窩頭，掖在腰里，偷偷帶給媽媽吃。媽媽稍稍見好，工頭幾次三番逼着她上班，威脅她再不上班就調牌（開除）。媽媽只好強挺着去做工。媽媽由于氣、急、累、驚湊到一起，身體一天比一天壞，瘦得皮包骨頭，工頭還照常打她、罵她。這時我也得了病，折騰得骨瘦如柴。

正在我病重時，小哥在街上叫車撞了，整個鼻子被撞沒了，上嘴唇和左眼上眼皮硬撕下來，象血人一樣。狗工頭知道後，冷笑地說：“別把他弄回來，扔到青草棵里算了！”三姐不忍心，在好心的工友幫助下，把小哥背回來，用鹽水給他消消毒，总算救了他的命。

媽媽在接二連三的折磨下，終于一病不起，她在病中總叨念說：“窮人什麼時候能見青天啊！”可憐她到底沒能熬到見青天那一天，在日本投降後不久，就扔下我們死了。

媽媽死了以後，我們三個孤兒的命運更慘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工人的生活照舊那麼苦，那些工頭依舊騎在我們脖子上。媽媽死後，接着遭到不幸的就是我三姐。在舊社會象她那樣的青年女工，除了挨餓受累以外，還有一層苦難——工頭的侮辱。我三姐長得挺俊，工頭總是糾纏不放。三姐寧肯挨打受罵也不受他們侮辱。工頭見擺布不了三姐，

恼羞成怒，便想方設法折磨她，刁难、找碴，动不动又打又罵。有一次干活，由于机器破旧，又加上心情不好，她的右手食指叫机器打了，工头不让去治，要她继续干活。她的手指越来越肿，后来竟有小擀面杖那样粗，手背肿得象馒头。后来，经过三姐他们车间的工人再三交涉，工头才让三姐去治。到医院一检查，手指骨全变黑了，只好把食指割掉，不然整个右手也难保了。那时的医院，哪把工人当人看，动手术时不给打麻药针，生往下割，三姐疼得死去活来。割完走回工厂，沿街昏倒好几次，血不停地往下淌。可是黑心的工头只让休息半天。第二天三姐上班，一边干活，手指一边往下滴血。

在这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三姐得了肺病，大口大口吐血。强挺着又干了一年多，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她才离厂到一个乡亲家歇着。在她临死的前几天，把我拉到跟前，轻轻对我说：“莲子呀，三姐也要跟着妈妈去了，再没亲人照看你，你自己要留心身体啊！我听人说过有个八路军，专门帮助咱穷人，你好好等着吧！也许有那一天……”可怜的二姐正在二十二岁好时候，就叫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

三姐才死，灾难又临到小哥身上。自从他叫車撞了后，工头就更不拿他当人待了，经常找碴口，后来把他撵了出去。小哥没处存身，只好躲在破防空壕里，白天拣煤核，换点吃的。我偷着去看他，见他在泥水沙土里爬滚，心象刀扎一样。

短短十几年工夫，万恶的旧社会就夺去了我的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的生命，害得我们骨肉离散，家破人亡。

这时，我已經十五岁了，調到精紡車間看机器。我們在一起干活的，都是十几岁的小童工。工头們不敢輕易欺負大人，便把一切坏主意都用到我們身上。我們每天腰不直、手不閑地干他們还嫌慢，上趟厕所也得挨打受罵。工头在木板上給每个人釘了七个釘，又給每个人做了一个小牌，誰上一趟厕所，就得挪一次牌，挪到第七个釘就开除。有的小女工不敢上厕所，連吓带急都得病了。木板上那些釘子象釘到我的眼里一样，每天看見它就生气。

有一天，一个小童工由于喝豆餅湯得了病，一上午就去了五趟厕所，下午一上班，他又想去。他瞅着木牌，急得眼泪汪汪地对我說：“刘姐，你看咋办？”我一看他那个可怜样，想起我乍进厂的情形，鼻子一酸，眼泪也流出来了。我心想：光忍耐也不行，得想办法跟那些工头斗！于是便和大伙說：“咱們都把牌挪到第七个釘上，不能受这个破板子的限制。他們要开除，咱們就一起和他們斗！”大伙一听，都說好，动手把牌都挪到最后一个釘上去了。

不一会，工头回来了。他瞪起两只賊眼，一看木板，大吃一惊！忙問我：“刘蓮子，你上了几趟厕所？”我抬起头，响亮地回答：“七趟！”我說完扫了大家一眼，大伙也明白了我的心意。工头瞅瞅我，又气哼哼地去問別人。十几个人都异口同音地答：“七趟！”“七趟！”

狗工头万沒想到我們来了这么一手！他气得象个癩蛤蟆似的，把木牌摘下来，狠狠地摔到地上。

当时，工人都用“磨洋工”来对付资本家。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有时干活是我打头，我想，不能再让小兄弟姐妹苦苦为他们卖命。工头来了，我就敲铁板，让大家快点干；工头走了，我就领着大家慢一点干。工头看见不出活，便狠狠地问我：“谁干活了？”我不紧不慢地说：“都干了，干得都挺好！”狗工头干生气，对我们没有办法。

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沈阳，沈阳市面，粮米奇缺，有些工人就偷着到开原一带去买粮。他们回来后，总带来一些解放军的消息。我当时由于年岁小，对解放军不了解。不过，回想一下我母亲和我三姐临终时嘱咐的话，我知道解放军来了就能见到青天。于是，我日日夜夜盼望解放军。

我们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了，我们工人翻了身，当上了国家的主人，不再是任人欺侮的牛马了。不久，我参加了厂里组织的歌咏队、秧歌队。我活了十六岁，只知道抹眼泪，现在生平第一次敞开喉咙唱歌，第一次挺起腰板扭秧歌。

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王国晨和另一些坏蛋被依法逮捕，还开了千人的公审大会。工人一个接一个指着狗工头的鼻子，控诉他们压迫、欺凌、污辱工人的罪行。我也在众人面前，大声说出了积压在心底的刻骨仇恨。

自从人民政府接管了沈阳麻袋厂，我，刘莲子，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和过去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工厂的领导同志见我年纪小，身世苦，特别关怀

我、照顾我。解放前，我們忍气吞声，連咳嗽声稍大些都怕犯厂規；如今，工厂是我們自己的，每个工人都享受着应得的权利和福利待遇。每天不到钟点，我就急着騎自行車去上班，再不象以前上車間走一步退两步，总也不願往里走。上班前，换上洁淨的工作服，下班后洗干净手和臉，心里总是甜滋滋的。由于在旧社会受的折磨太深，我的体格很弱，几年前，我得了腎炎，厂里想尽办法給我治疗，还給我送苹果、送鸡蛋。

解放不久，我就和同厂的一个工人結了婚。我們一同受过苦，婆婆也曾在旧麻袋厂做过工，都是一个根子上的人。

“家”就在麻袋厂宿舍里，牆刷得白白的，冬天炕燒得热乎乎。当我們坐在热炕上，想起过去冰窖似的“号子”，三人合盖一床薄被的那个惨状，这真是两个天地呀！

我現在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今年十六岁，二女儿十二岁，小儿子八岁。他們生长在幸福的毛澤东时代，和我們兄弟姊妹的童年不能比。在我大儿子这样的年紀，我的二哥早已經被生活所逼出海去打魚了；在我女儿的这样年齡，我已經在工头的棍棒下，受了四年的罪。假日，孩子們去北陵野游，去剧院看戏。我和三姐、小哥，解放前在沈阳住了多年，根本不知道北陵在哪里，連电車也沒坐过。我常想，如果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我，刘蓮子，哪能有今天？我决不能“好了瘡疤忘了痛”，我要永远記住过去的階級苦，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走。虽然，由于旧社会的摧殘太深，我的身体不够好，但是，我有决心战胜一切困难，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献出自己的一切。

辛酸的学徒生活

哈尔滨亚麻厂工人 姜其凤 口述

群力 整理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昌邑县。爷爷活着的时候，家里有三间草房、二亩地。后来淮河涨水，房子被冲塌了，地也被淹没了。爷爷一股火急病了，不到半年就死去了。爷爷死后，爹为了谋条生路，独自一人闯了关东，在老乡的帮助下，进了安东（现在改名丹东）义泰祥织绸厂当工人。

一九一七年我出生了。在我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娘就因病没钱治死去了，把我扔给了孤苦伶仃的姥姥。姥姥不顾风吹雨打，靠着要饭来维持我们一老一小的生命。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到九岁，能帮她干点活了，姥姥却因饥寒交迫，劳累成疾，离开了人间。

爹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把我接到了安东。这还是我出生后第一次看见爹。我们父子一见面，又是欢喜，又是悲痛。到了安东后，爹要把我留在他的身边，可是那狠毒的义泰祥老板，说什么也不准我和爹在一起吃、住。爹被逼没办法

法，只好把我送去住小店。住小店要花钱啊！爹每月才挣十元钱，怎能担起这样的重担哪！眼看日子没法过了，爹只好把我送去学徒。

—

一九二七年，爹托人找保把我送到八道沟东泰棧織綢厂去学徒。掌柜的说，满十二岁才能正式学徒，我那年才十岁，得学五年才能满徒，头两年算白干。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爹硬着头皮叫我干下去，从此我又离开了爹，落入资本家的魔掌。

东泰棧是个小厂，有十几架木制織綢机，掌柜的一家都住在厂里。我一进厂，他就把我当成他们家的奴才使唤，连车间的门也不叫我进。整天起大早、贪大黑干他家里的零活。除了倒尿壶、倒灰、扫院子、劈柴外，剩下的时间就是给他看孩子。孩子一哭，女掌柜不是掐我就是拧我。干活稍不顺他们的眼，就是一顿暴打。我的身上被他们打得长年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没个好地方。我在他们家过一天就象过一年似的，成天盼着和爹见一面，把我受的苦跟他说一说，可掌柜的总不叫爹看我。爹每次给我送衣服，都是管账先生给我拿进来，我一看见衣服，心里就象刀搅似地难过，但我不敢哭，只有把眼泪咽在肚子里。

过了一年半后，有一次，爹来给我送鞋，赶巧这回掌柜不在家，爹跟管账先生好说歹说，才答应我们父子见一面。

我一听说爹来了，眼泪就象断线珠子似地往下掉，等见着了爹，就紧紧地抱住他的大腿，呜呜地痛哭起来，我说什么也要跟爹走，要跟爹在一块。爹看着我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眼泪也止不住地掉下来。他难过地对我说：“孩子，这年月，咱又没个吃住的地方，你不在这里干，上哪去啊！……”爹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后来他强做笑脸安慰我说：“再挺一挺吧，往后兴许能好些。”

我在东泰棧整整干了两年，可是一点手艺也没学到。后来东泰棧失了火，房子、机器烧了个光，我才离开了那里。

一九二九年初，爹又把我送到财神庙街的双兴织布厂去学徒。这年我已经十二岁了。双兴织布厂是当时安东最大的织布厂，有二百零八台铁架子的织布机，还有浆纱机和锅炉。这个厂有两个掌柜的，有大工头，还有四个专门监工的二工头。工人一进厂就得立保条，规定三年满徒；学徒期间，一切工伤事故工厂概不负责；中途退厂得包赔饭伙钱。

进厂后，就让我学接线头。头一个月不让上机台，先在一个木架子上练。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一练就是十四五个小时，除了吃饭外，一会儿也不让歇着，我的两条腿站得都不能回弯了，两只胳膊又酸又麻，木胀胀地难受。可是为了早点学会手艺挣碗饭吃，我咬着牙挺着练下去。

好容易熬了一个月，以为到机台接线头就好了，那曾想上了机台就象上了套的牛马，连个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双兴工厂的织布机昼夜不停，接线头的学徒没有固定干活的时间

間，不管白天黑夜什麼時候擡軸，什麼時候就得去接綫頭。接一個軸的綫頭，少說也得兩三個小時，一天最少要接四五个軸，多时要接六七个軸。人跟着機器轉，從來也沒睡過一回足覺，把我累得倒在炕上就象一堆爛泥。有時剛一睡下，工頭就來催你去接綫頭，那怕是半夜，也得趕緊爬起來，去晚了就得挨揍。有一回，已經是半夜了，我剛躺下，姓常的工頭就來喊我去接綫頭，我實在困極了，糊里糊塗坐了起來，不知怎麼又迷迷糊糊地倒下睡着了。過了一會兒，姓常



的工头看我还没到，气哼哼地跑来，用一只胳膊把我拦腰夹到当院往地下一扔，就用打梭棒不住点地打起来，打得我满院子爬滚。他把我打个够，还罚我在院子里跪着，气得我真想上去咬他几口。

在双兴厂当学徒还有一种附加的苦役，从工厂往布庄送布，或是往厂里运材料，都是学徒的在干活的时间以外去扛运。每次送布，不管你个子大小，都得扛五匹。那五匹布罗在肩上，我伸手都够不着顶。有一次，我去送布，布庄离工厂挺远，五匹布压得我溜歪斜，走到半道上，顶上的一匹布滑落下来，沾上了点泥，布庄不收。掌柜的知道了，就把我毒打一頓。

二

工人，特别是徒工，在旧社会挨打受气是极平常的事。资本家雇人的目的都是要千方百计地在我們工人身上榨取每一滴血汗。双兴厂掌柜的剥削工人的手段又多又狠。

我在双兴接了一年多线头后，因为平常留神，把织布的手艺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这时掌柜就叫我和老工人一样上班看机台织布。这不光是对我，对别的徒工也是这样。这个厂子经常有一百多徒工。资本家这样大量招用徒工，就是他的—种剥削手段。一个徒工三年满徒，三年—共挣一百元钱，抵不上一个工人半年的工钱。可是—个徒工—年以后就能看两个机台，两年以后就能看三个，完全顶一个熟练工人干活

了。这样，双兴厂的掌柜，就可以用一批更廉价的劳动力，获得大笔的額外收入。

双兴厂的上工制度，是六个钟头一个班，一个人一天要上两个班。看起来这种班好象挺輕巧，干六个钟头的活就叫你歇六个钟头。其实这也是掌柜的一种剝削手段。他怕工人連着干十二个小时受不了，出活少，中間吃飯还得停机器，就采用这种六小时一班的办法。这样机器可以不停地轉动，下班后、上班前吃飯的时间，都在那歇班的六小时里。这样，实际上工人干完一班只能歇三个多小时。起初我以为上了机台就熬出了头，誰想到越干越觉得沉重。赶上晚間十二点钟接班时，常常是連飯都顧不上吃，手拿着大餅子就往車間跑，稍微晚到一会，就要挨頓暴打。白天下了班，还常叫去干那些扛、运的活，有时来回都是重脚。我們被折騰得精疲力尽，两眼一道道的紅絲，面黃肌瘦，手脚酸軟。有一天，我早六点下班后，厂里叫我和另几个学徒去扛面。一直扛到要接十二点班的时候，我嘴里嚼着飯去上班，强挺着干到晚六点，又累又乏，渾身象散了架子似的，連飯也沒心吃了，忙着躺下去睡觉。才一眨眼的工夫，又到接班的时间了，我用手使劲拍了拍头，匆忙地扒拉了两口飯，就强打着精神去接班。勉强支撑到一点多钟的时候，就觉得头昏眼花，耳朵也轰轰响，不知不觉就昏昏沉沉地倒在地下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觉得誰突然一脚踢在我身上，我猛一惊醒，睜眼一看，原来是姓胡的工头恶狠狠地瞪着两眼站在

我身旁，他操起打梭棒，劈头盖脑地照我打来，打得我屁股上、大腿上起了一道道的大檩子。

人身都是肉长的，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禁不住这么摧残。那时我们双兴厂的工人顶多能干到四十来岁，身子就被拖垮了。这时候，为资本家耗尽血汗的老工人，就要被掌柜一脚踢开。当时安东有句俗话：“元宝山发了黄，织大布的叫了娘。”一进冬天，厂子活少了，工厂就往下裁人，那些瘦骨嶙嶙的年老工人，就从此失业了，顶替他们的，就是我们这种廉价的徒工。

双兴厂掌柜的还有一种剝削手段，那就是没有星期天，一年到头，只放三次假，端午节、中秋节各放一天，春节放七天。这已经够少了，可是我们学徒的，就连这一点休息的权利也没有。一到放假，所有的杂活都要摊在我们徒工的身上。就拿春节来说，掌柜为了平时不停工，每年春节时，镗锅炉里的水锈，都是叫学徒来干。因为我个子小，进出锅炉方便，头两年这个活都叫我摊上了。镗水锈得躺在锅炉里镗。锅炉停火后，炉胆还热得烙人，一进去就是一身汗，连气都喘不过来；过三天炉胆凉了，里边又阴森森的冷，象进了冰窖，冷得浸骨头。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除了吃饭出来一会儿外，不叫歇气。我们好几个人，得整整干七天。等干完出来，就象害了一场大病，两眼熬得通红。这就是我们七天的“休息”！

熬到十五岁，我该满徒了。可是到了满徒那天，却没人

来告诉我。这几年我哪一天不是数星星似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啊！急得我不能再等了，就去问那个姓胡的工头，他一听就火了：“你满什么徒？你病了一个多月还没补，就满徒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原来是这样：在我学徒的第三年伏天，我得了霍乱，身上发烧，上吐下泻，起不来炕。病了一个多月，差点没把命搭上，多亏住在一起的师兄弟们的照顾，才慢慢好起来。这一个多月里，掌柜的根本不闻不问，可是到了满徒，他却记得一清二楚，真是把我们算计到骨头里去了。我到底晚出徒一个多月。

满徒以后，我以为这回可真该出了头，可谁想到因为我是这个厂子出来的，工头照样把我当学徒使唤。下了班，有时还叫我往布庄送布，厂里买了东西，还派我往回扛。我越想心里越憋气，下决心不在双兴干了。我想，凭我的手艺，到哪儿还挣不来饭吃。那时我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掌柜的认为我这时正是给他们卖命的好时候，当然不能把我放过。当时工厂规定，年轻力壮的工人退厂，得经过“劳动组合”办手续。可是，“劳动组合”是资本家联合办的，他们互相勾结，一个鼻孔出气，工厂的资本家不让走，“劳动组合”当然不会给办手续。不过我这走的主意是拿定了，今年走不了，明年也得走。后来，我假造了一封关里家来的挂号信，说家里老人病重，非得回去不可，这才离开了双兴织布厂。

我在双兴织布厂学了三年徒，织了五年布，临走时除了

一个小鋪盖卷外，两手空空，什么也沒掙下。

离开双兴織布厂以后，我又轉了几个厂子，也到过沈阳、錦州、營口，可是在旧社会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儿也不是好混的。一直到解放后，我才真正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解放后，我进了安东紡織厂，做了保全工，后来又担任技术檢查員。一九五一年九月，我轉到哈尔滨亚麻厂，参加安装浆紗机。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二年末工厂正式生产后，我担任織布車間副主任。一九五三年亚麻厂成立了保全部，又把我調去担任保全部副主任。一九六二年，厂部动員干部充实第一綫时，我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主动找党委要求下車間，現在我是准备車間的保全工。过去我沒有文化，是个睜眼睛，一九五四年九月，党送我到工农干部文化学校学习了二年，現在我能看书看报和写信了。这都是党对我的培养和关怀的結果啊！

旧社会我們被統治階級說成是臭工人，新社会我們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一想到这，就觉得渾身有着使不完的勁。別看我今年四十九岁了，可是身板比二十多岁时还硬实，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下定决心，要为党的事业忠心干一輩子，党叫干的事，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干。我还要教育我的孩子，要他們永远听党的話，永远跟党走！

两代装卸工

梅河口車站职工家屬 齐大媛 口述

中共吉林铁路局通化分局宣传部 整理

我老伴齐万庆（又叫齐子余）在旧中国和“伪滿洲国”的时候，是个扛脚行的。我大儿子齐国森，是咱們新中国的装卸工人。老伴的过去和儿子的今天一比，可真是一个在地獄，一个在天堂啊！

我老家在河北省玉田县，祖祖輩輩都靠种几亩薄田过活。本来就是吃这頓沒那頓的，可偏偏又遇上軍閥連年混战，什么“軍餉”啦，这个“捐”、那个“稅”啦，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实在逼得沒法，家乡的人們就四处逃荒。在我和老齐結婚的第二年（一九二六年），他听说关东日子好混，就跟我商量要到关东闖闖。为了生活，我只好一个人留在家乡，让他闖了关东。四年以后，我也跟他来到了沈海铁路（沈阳至海龙）的英額門車站。在英額門，他托亲靠友，

好歹算找了个活路，在車站上扛脚行。那时候，把头淨抓“白帽子”，来了新人就先敲你一下，給你来个下馬威。老齐是个庄稼人，种地是把手，背背扛扛的可不入門。一开始，把头就让他扛着二百多斤的大袋子上跳板。他一上跳板就头晕眼花，离拉歪斜的。把头一看他是个外行，就說：“哼！扛不了几百斤，还想靠肩膀头吃飯！”开工錢的时候，就借故說他扛得少，克扣他的工錢。他心里明白，心里恨，可为了能保住飯碗，只得忍气吞声地干下去。就这样干也不行，把头还逼着三天两头給他送礼。不送，就找你的别扭，不是說你这不对，就是說你那不对。有一次，把头叫老齐扛一件笨重貨物，他搬了搬，沒搬动。把头就怒气冲冲地罵他：“你这两下子，能扛脚行嗎？快滾回家吃去吧！”他一听，心里真不是滋味，一上火，一咬牙，使出全身的力气，就把那件貨物搬了起来，送到了指定的地点。把头却說：“放的不对，扛到这儿！”“还不对，扛到那儿！”誰不明白这是故意找岔儿，他是个直性子，哪能受得了这口窩囊气。一气之下，就把那件貨物摔到地上，冲把头說：“干不了！”說完，他就收拾起行李卷，把家搬到了山城鎮。

在山城鎮照样混不上飽飯吃，又搬到草市。那时候，我剛剛生了大丫头，还没有滿月，就跟他到了草市，要吃沒吃，要燒沒燒，連个落脚的地方也沒有。还是老工友武方純帮我潤找了一鋪炕，又找了几个工友湊了几个錢，給我們买了一个鍋、两个飯碗，才算安了家。沒住几天，又呆不下去

了。只好又回英額門。

后来，有一个同乡說清原車站的活好干些，就把老齐拉到清原。其实，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到哪里，穷人也是受压迫，受剝削。有一次，老齐干活时不小心打了一箱玻璃，把头就把他解雇了。

在这以后，我們一家人又从关外跑到关里，从关里跑到关外，先后住过朝阳鎮、海龙……好几个車站，还跑到黑龙江省的克普河車站呆了大半年。一九三九年，我們一家人又来到了梅河口車站。老齐（这时改名齐子余）还干他的老行当——扛脚行。

二

梅河口車站挺大，干活的人也挺多。小鬼子为了压迫和剝削工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組織叫“国际”，管理車站上貨物的装卸。“国际”的下面，还有大把头、二把头。扛脚行的起早貪黑，拚死拚活地干，挣几个錢，还得受“国际”先生（在“国际”里管事的人）、大把头、二把头的层层盘剝，到自己手的就没有多少了，根本就糊不住嘴。就是这样，逢年过节，还得想法給“国际”先生、把头們送礼，要不，他們就找岔儿，輕了打你一頓，重了送警备队过电、灌凉水。

那时候，扛脚行的十有八九娶不起老婆，“跑腿”的都住在工房子里。有的有个破行李卷，有的連个破行李卷也没有，就只好枕磚头，鋪席头，盖麻袋片。有人实在沒

法，找把乱草垫在身下，鬼子看见了还要破口大骂：“八嘎！你们猪的一样！”也常常有人因为这个挨打挨罚。

这种日子谁能受得了？没过几年，老齐就被折磨得不象人样，得了“喉巴病”，瘦得皮包骨，半宿半宿地咳嗽，大口大口地吐黄痰。就这样，还得咬着牙上工，实在不行，就吃点“顶药”挺着干。工人兄弟们都照顾他，干活时只叫他“看堆”、“搭肩”，干些轻的，不让他干重活。可小鬼子和把头们，却百般刁难，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对，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地骂起来。

老齐性情耿直，不会花言巧语地奉承人，又没钱给鬼子、把头送礼，就得天天挨打受骂。有一天，他把货箱放错了位置，有个叫川田的鬼子来对票，一看摆得不对，就一瞪眼睛：“八嘎，牛的一样，打死你的得了。”说着，就操起棍子打起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幸亏工友们跑过来拦挡，才算了事。还有一次，站内丢了一箱烟卷，日本鬼子和把头们看我们家穷，就硬说是老齐偷的。特务头子方治国领着一伙人闯进我们家，叮当乱翻一阵，连耗子洞都捅到了，也没翻到啥。临走的时候，特务方治国厉声厉色地对我说，“齐子余回来时，让他到警备队去一趟！”老齐到了警备队，就被扣起来。后来，烟卷找到了，才把他放回来。在那个世道，印把子掌握在他们手里，咱们穷人有冤又到哪里去诉哇！

老齐回到家来，又憋气，又窝火，再加上活计累，就病

倒了。他病倒之后，我就领着几个孩子做苦工、捡煤核，对付着混。飯都吃不上，哪里还有錢給他治病？这年二月二那天，有錢人家烤猪头燎猪爪，連炒帶煎；可我們家，已經几天沒見米粒啦。老齐圍着一件破棉袄，一声接一声地咳嗽；我看着空空的米袋，瞅着几个餓得面黃肌瘦的孩子，心如刀攪一样，眼淚在眼圈里直轉轉。三个孩子都知道我心里难受，呆呆地坐着，誰也不吱声。一家人就这样从天亮一直坐到小半晌，后来还是我开口說：“挺，不行啊！孩子，跟媽走！”我們娘四个来到街上，眼淚汪汪地东瞅瞅西望望，不知往哪去好。正在这为难的时候，一个摊煎餅的老乡看到了我們，給了我一卷煎餅。我刚把煎餅接到手，小三拿过去就往嘴里塞，大小子（齐国森）的手也伸了过来。大姑娘已經懂点事了，她看着国森說：“爹病的那样，还没吃一点东西哪！”听到姐姐的話，国森咽下了口水，縮回了手。小三見哥哥不要了，也把送到嘴的煎餅拿出来給了我。我看了看孩子們，低下头，眼淚簌簌地流下来……。

老齐的病，越来越重，已經有几天沒吃东西了。大姑娘把起早貪黑捡来的煤核卖了五角錢，要給她爹买药。我看了看餓得直不起腰来的孩子們，就想先給孩子們买点苞米面。可是，轉过臉一看她爹，喘不上来气，臉憋得发青，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說：“还是去給你爹买点药吧。”

就在这个时候，把头还三番五次地来找別扭，一会来要帽子，一会来要垫肩。房东也三天两头来逼房租，不交房

租，就要攆我們搬家。老齐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恨，病情也就越来越重，沒几天，他就含冤死去了。

三

他爹死后，日子更难熬了，真是苦胆加黃連，苦上加苦哇！夏天，我就和大丫头出去做小工、洗衣服，給人家縫縫补补，大小子就去給地主放猪、放牛。冬天，我就領着孩子們起早貪黑地撿煤核。有时候，不得不出去要点吃的。

那年头，撿点煤核也要挨打受罵。警备队那帮野兽，无恶不做。男孩子还好些，象我大丫头那样十几岁的女孩子，就担心叫警备队抓去給糟踏了。就为这个，大丫头出去撿煤核的时候，我就給她打扮个男孩子模样。有一天早晨，我們一帮人正圍着炉渣堆撿煤核，忽然傳来了打罵声和狗咬声。我抬头一看，是特务方治国牵着警犬来了。这个野兽連打帶罵地踢撒了我們撿的煤核，踩碎了我們的筐，把我們拴在一条绳子上，拽到警备队的院子里，叫我們給他拔院子里的草。一直熬到天黑，給他白干了一天活，还被他臭罵了一頓，才放我們回家。回家之后，国森就得了一場大病，整天躺在炕上直說胡話，一直病了一个多月。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敢让孩子们去撿煤核了。

出去討飯，就更难了。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連天，都得走出几十里地。回到家总是腰酸腿疼，头昏眼花。有时候还得空着手回来，啥也要不着。有一次，我領着孩子們去东

丰县的五道崗要飯，走进一家大院，屋里有說有笑，財主正在吃喝玩乐。見我們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就妖声妖气地罵：

“哪家的穷鬼，这么早就跑到这来要飯！”她不但不給，还叫狗咬我們。我一看不好，領着孩子們就跑。跑了老远，我只觉得脚疼得厉害，坐下来一看，脚跟裂开了大口子，鮮血直流，脚不敢沾地了。国森搀着我，一瘸一拐地走了回家。

四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八，梅河口解放了，我們一家人才开始了人的生活。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我大儿子齐国森当了工人，和他父亲一样，也在梅河口車站当装卸工人。但是，国森是社会主义铁路事业的装卸工人，工人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对装卸工人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規定超过一百公斤重的物件不让工人扛。同时，还不断增加装卸工具，減輕工人的体力劳动。你看，現在装卸工人用“虎头車”来回搬运貨物，大物件就用吊車装卸，这該有多么省勁和安全啊！这还不算，党还給工人們准备了各种劳动保护用具和設備，真是一切都变了。

一九五二年夏天，党还让国森脫产去学习文化。当他进学校时，我不禁想起了一段辛酸的往事。他九岁那年，看見別人家小孩都去上学，他也要上学。我領着他到学校去报名，哪知一进学校門就要学費。那时候，他爹正病倒在炕

上，哪里能交得起学费？我只得含着泪把他领回家。从此上学的事，连做梦都不敢想了。想不到，今天竟有了上学的机会。说真的，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哪能有这样的好事呀！想到这，我不由地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在党的教育下，国森的觉悟提高很快，他心里想的完全是他的作业所。一九五六年他被评为吉林铁路局的先进生产者。就在这年六月三十日，国森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又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五好工人，今年他又被评为吉林铁路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五好职工”。

国森常跟我说：“妈，如今咱们生活得很好，可是，咱们的国家还一穷二白，世界上还有很多阶级弟兄，过着咱们在旧社会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咱们应该好好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的彻底解放献出全部力量。”我一想，国森说得对，是应该这样做，咱们不要忘本啊！

我也常和我的孙子们说：“你们生在新社会，算是生在了好时候了。好是好哇，可不要忘了你爷爷、你爸爸他们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长大了，也要象你爸爸一样，紧紧地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碼頭工人的昔泪今歌

——记大连港退休老工人张少卿对旧社会的控诉

林 源

八十一岁的养老工人張少卿，出生于湖北省黃崗县一个手工业工人家里。十六岁时，当木匠的父亲死了，他同哥哥靠卖零工养活母亲。二十六岁那年，母亲死后，他便离开了家乡，在汉口一个外国人开办的牛皮厂里当杂工。挨打受罵逼得他又奔到上海，在碼頭当搬运工，在紡紗厂当紡織工。当他五十五岁那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工厂遭受破坏而倒閉。他无家可归，就同九十一名上海失业工人一起，被騙来到大連“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当搬运工。

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船剛进大連港，还没等靠近碼頭，招工头苏天功就对躺在艙里的工人，边踢边罵：“还他媽的不起来下船！”張少卿他們在工头的打罵声中，背着行李走出船艙。

二月的大連碼頭，刺骨的寒风夹着清雪，冻得他直打寒战。他抬头往碼頭上看去，只見那些搬运工人，多是衣不蔽

体，披着破麻袋、破草袋子在干活。还有一些凶神恶煞的工头，在挥舞着棍棒打骂。張少卿正看得惊异出神的时候，一个戴有金綫肩章的警察①，用刀鞘狠狠地捅了一下他的腰說：“快打开行李！”接着开始了搜查。

張少卿看着这一切，心情沉重极了。他知道这是火坑，也只得随着人群，跟着招工头苏天功，走进了門卫森严的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碼頭工人住的“紅房子”②。他和伙伴們把行李放在連坐着都直不起腰来的吊鋪上，觉得屋里又暗又冷。屋子里的光板水泥炕上、光木板吊鋪上，零散地放着些破麻袋片、断磚头一类的东西。張少卿还以为这是没人住的空房子，想把磚头一类破东西扫出去。招工头苏天功馬上厉声厉色地喊：“別动！那里已經有人住。你們就插着磚头和破麻袋片空子住。”和張少卿一起由上海来的共九十二名工人，在船上两天都沒吃东西。張少卿餓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問苏天功：

“先生，怎么还不給咱們开飯？”

“不給你們放在那里啦嘛！还等我喂你們？”苏天功指着放在水泥炕上一个籠屨布盖着的竹筐，冷笑着說。

張少卿他們揭开屨布一看，筐里装的是譬得发綠的苞米

① 日寇警察和汉奸警察，都戴有金綫的肩章，工人就叫他們大金綫。

② “紅房子”南面原是一个树木丛生（后为日寇砍伐）的山崗，日寇就把这个“华工收容所”叫做“碧山庄”。因房子是紅磚盖的，工人叫它“紅房子”。

面窩窩頭，旁邊放着一鉢子渾澄澄的蒸鍋水，和一鉢子咸蘿卜條子。有的青年工人一看這些吃的喝的，便質問蘇天功：

“在上海時，你不是說，來到大連，全吃大米白面嗎？怎麼給咱們吃這個？”

“想的倒好！吃大米白面，你們配有那份口福？別囉嗦，快吃完拿過去！”

張少卿當碼頭工人的苦難生活，就從此開始了。

上碼頭干活的第一天早晨，還沒等到規定的時間，“紅房子”南面廟里的“催命鐘”^①就敲響了。這個鐘一響，工人得馬上起床吃飯。這時候，大頭劉茂敬、二頭蘇天功，總是掄着粗藤棍、鎬把，在紅房子里到處串，凶狠地毒打那些起得晚了些的人。

張少卿起身吃完飯，戴上帶有“福昌”字樣的勞工帽，拿着勞工票，跟隨二頭蘇天功，在打罵聲中，走進碼頭卡子門，沉重的勞動就開始了。

原來，蘇天功在上海招工時說：搬扛最重的活就是百十斤。可這時裝卸的貨物都在一百六七十斤以上。張少卿三十來歲時，在上海碼頭當臨時搬運工，干這樣的活，還能應付一陣子。可現在他已是一個五十五歲的老年人了，再這樣背扛，實在是夠受的。更難的是：從火車上往下卸貨，十來個

① “紅房子”南面有一座廟，每天早晨五點敲鐘。鐘一響，工人得馬上起床吃飯，六點到碼頭干活。這個鐘聲一響，就給“紅房子”碼頭工人帶來了種種不幸，於是工人就給它起名叫“催命鐘”。

人，必須在四十分鐘內卸完一車廂貨。按“福昌”規定的裝卸時間，只准提前卸完，不准拖延一分鐘。倘有拖延，就得挨罰，扣拖延車船周轉的費用！日本帝國主義就是用這狠毒的一招，把大連碼頭每年吞吐量一千萬噸以上的貨物，全由三四萬中國工人按時裝卸完。張少卿和他的伙伴，為了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卸完貨，只得咬緊牙帶着小跑，扛着麻袋包，從帶有很大坡度的跳板上走下來，累得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

就是這樣拚命地干，日寇監工、中國工頭以及那些背槍、帶刀、拿棍棒的大小爪牙，只要看你慢走幾步，覺得你不順眼，就打你一頓。有一天，張少卿在卸最後一節車廂時，他實在不能象開始那樣快速搬扛了，在他放下肩上的麻袋包，空着手往回走的路上，慢走了幾步，一個日寇監工，就出其不意地朝着他的腿肚子踢一脚，嘴里還罵着：

“……磨洋工的不行！”

張少卿剛要分辯，二頭蘇天功，象跟在主人身後的惡狗，狠狠罵道：

“你他媽的就是慢！”

張少卿回了他一句：“我累得氣都喘不上來了，還慢！”

二頭見這個剛來的“苦力”竟敢頂撞他，拿着手裡的粗藤棍，就朝張少卿的頭上、身上猛抽。

有時往船上裝豆餅，五十斤重一塊的豆餅，每人一次最

少得扛三块。船主为了多跑一趟船，要求装货缩短时间，工头就在搬运工人的肩上加码，从三块增加到四块、五块、六块。就是这样，一天至少得搬扛十二个小时，压得张少卿周身筋骨疼痛。



他们每天劳动的收入却少得可怜。一个最强的劳动力，每天搬扛九吨货物，除掉日寇统治机关、“福昌”、工头们的层层克扣剥削，落到工人手中的，最多也只有八角钱。体弱生病的人，工资所得连饭费都不够，还得欠工头的债。张少卿一进“红房子”，就已经是年老体弱的人了，他拚命地干，每天所得，除掉被扣除五角五分的伙食费、工头名目繁多的扣款，以及没按装卸时间装卸完的罚款，头几个月，他不但没领到一分钱，反倒卖光

了仅有的一点衣被。

一九三九年冬天，严寒来得特别早。农历九月十三傍晚，鹅毛大雪就在码头上铺了三寸来厚。张少卿和无数码头工人，赤脚光膀地遭受了这意外严寒的袭击，都冻得嗦嗦颤

抖。一个日寇“大金錢”走过来，看到他們那冻得顫慄的样子，还嘲弄說：

“冷嗎？死啦死啦頂好，中国苦力大大的有！”他呲着牙，一面說着，一面順手抓起一把雪，扔在近处一个工人的光膀子上。

这天下工后，張少卿回到“紅房子”，好說歹說才从工头那里借了一点錢，买了两条破麻袋，从麻袋底剪个窟窿，伸出脑袋，再在麻袋两个底角剪两个洞，伸出两只胳膊。这就算是过冬的衣裳。同他剛到大連时看到的碼頭老工人一样，穿上了麻袋衣、盖上了麻袋被（几块破麻袋片），枕起了破磚头。“紅房子”里不生火，吊鋪上面挂着霜，夜晚一个屋二三百人，全靠挤在一起取暖，才能睡着。張少卿就是这样，度过了大連碼頭工人生活的第一个冬天和第二个冬天。

到第三年春的一天，他在三号碼頭往一个日本船上装硫酸。当他把装有硫酸坛子的木箱，用绳子捆好，把绳子挂在輪船杆的吊鈎上，硫酸箱剛剛被吊起一人多高，由于吊鈎有毛病，吊起的木箱傾斜了，硫酸坛的盖子掉了，硫酸从坛子口撒出来。站在下面的張少卿，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硫酸就象数条毒蛇，从他的脖子上，爬到胸前、背后、腿上、脚上，从肩上爬到胳膊、手指梢。濃烈的硫酸，把他燒得昏倒了。这时候，如果不是身边十几个工友护卫着他，殘暴的日本船主、凶狠的工头，还要用毒打来“抵銷”那撒了的硫

酸。

等張少卿苏醒过来，工友們已經把他抬回“紅房子”，放在吊鋪上。大头刘茂敬来到他的吊鋪前，指着他气势汹汹地說：“怎么沒一下子把你燒死！好啦，你进‘医院’去吧，我这里养不好你的伤！”

張少卿明白，这是工头要赶他出“紅房子”，就向刘茂敬要求說：“刘掌柜，用不着进‘医院’，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抬他回来的四个工友，也在一旁替他說情：“留下他吧，只燒伤了点皮肉，沒伤筋骨，好了还能照样干活。”刘茂敬看着站在張少卿身边的四个工人，又看看張少卿确实沒伤着筋骨，觉得把他留下，将来还能榨到点油，就装腔作势地說：“好吧，过几天看看，不行再送‘医院’。”

“不行再送‘医院’。”这句话引起了張少卿一段痛心的回忆和联想。和他一起从上海来的小刘，到“紅房子”还不到半年，在碼头上搬运生铁块，砸坏了右脚。就是这个大头刘茂敬，逼着他进了“医院”。过了不到半个月，張少卿去看小刘，他的脚不但沒見好，右腿脛骨也发黑了。不到二十天头，一个硬帮帮的小伙子，就白白地被葬送了。張少卿知道，当时的碼头医院，根本就不是給工人看病的场所。它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秘密屠杀中国伤残病疾工人的场所。因此，他宁肯全身烂成千瘡百孔，也不进那杀人的“医院”。

張少卿沒有进“医院”，身体被硫酸燒过的地方，先是

潰爛，接着是滄黃水。他在工友的護理和幫助下，在吊鋪上躺了兩個多月，度過了工頭的迫害關，熬過了傷痛的折磨，終於又走上了碼頭。

比經濟上剝削、肉體上摧殘更殘酷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張少卿來到碼頭第二年初冬的一天，他同三十個工友，從早晨六點到下午六點，剛剛卸完日本船上的貨物，還沒等離開現場，兩個日寇“大金錢”，凶煞煞地走過來，叫他們快排好隊。接着，這兩條惡狼，對着三十來個工人，逐個輪番地連踢帶打起來。把每個人痛打了一頓之後，又拿出幾支粉筆，叫每個人都寫幾個字。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兩個日寇是要查找在貨艙底下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標語的人。這次張少卿挨了打，可是當他得知挨打的原因後，卻感到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痛快！他知道，就在碼頭上，還有人在暗中和鬼子作鬥爭。

和張少卿一起由上海來的伙伴，由於沉重的勞動和惡劣的生活條件，加上工頭的毒打，到一九四三年春天，才四年多的時間，原來的九十二人，只剩下三十來人了。張少卿深深感到，他再在這裡干下去，性命也難保了。他決定逃出“紅房子”這個殺人場。一天早晨，趁上工走在路上的機會，他同另一個工友，逃到了沙河口機械二廠。他倆逃脫“紅房子”虎口還不到三天，二頭蘇天功，便到那裡把他倆抓了回來。原來，他們逃往的工廠，是大頭劉茂敬和別人合開的。被抓回來的那天晚上，他倆在屋裡整整被吊了一宿。

在工友們的要求下，第二天早晨他倆被放下來了。吊了一整夜，加上毒打，兩個人一被放下來，就癱倒在地。大頭劉茂敬，乘機恫吓工人說：“你們都看見了吧？誰要想跑，誰就得尝尝這吊起來的滋味。你們到這里來，就別想活着跑出去。孫猴子再能跑，也跑不出如來佛的手心，跑到哪里都能把你們抓回來。”五點多鐘，工人都上工去了，大頭劉茂敬，又指使蘇天功和坐堂（管賬的）先生，各拿一個破鉢子舀了一下子大糞，然後撬開張少卿和他的伙伴的嘴，硬給他倆灌了一鉢子大糞。張少卿惡心得整整吐了一天，第二天又被逼上碼頭去干活。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中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旅大人民解放了。隨着日寇的血腥統治機器被砸碎，它在旅大的大小爪牙——漢奸、走狗、工頭一類的垃圾，也被人民掃蕩了。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大連碼頭工人的爪牙——直接殘酷迫害、剝削張少卿和他的伙友們的大工頭劉茂敬、二工頭蘇天功，這些民族的敗類，也受到了應有的懲處。張少卿，再也不是“窮苦力”了，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態，愉快地勞動在碼頭上。旅大解放七年後，這位老工人便被接進工人養老院養老，受到黨無微不至的關懷。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整整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來的大連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的碼頭工人，在黨的領導下，已經完全擺脫了笨重的體力勞動，實現了搬運

机械化。工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張少卿这个解放前的碼頭“苦力”，解放后当家做了主人。他在一九六一年，当选为第四届旅大市人民代表，一九六三年又被連选为第五届市人民代表。这个在旧社会飽尝苦难的老工人，現在，每当他参加討論和表决国家大事的时候，都充滿了工人階級的自豪感。

現在，每当成群結队的工人、解放軍、干部、学生，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职工，来到旅大工人养老院，請他讲述旧社会碼頭工人的血泪史时，这位老工人，都以自己的亲身經歷，来傾訴碼頭工人的血泪史。說到解放后的生活，他总是无限深情地說：“若是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象我这样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早不知死在哪里了。現在，我不能劳动，党和毛主席还派人照看我們。我現在虽然不能亲身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但，我要把过去的苦告訴青年一代，讓他們更好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話，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我要做的一点点工作。”

一个油工的今昔

长春市公私合营益发合植物油厂工人 王志成 口述
长城宣 整理

我今年四十五岁，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八个年头。这二十八年我没过着一天好日子。

逃 荒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阳谷县，一家四口人，没有房子没有地。我爹一年到头给地主当牛做马，也养活不了全家。在我六岁那年，家乡闹了灾，地主趁机抬粮放债，重利盘剥，逼得穷人实在没法活下去。为了求条生路，爹就咬着牙，领着我娘，挑起我们兄妹俩，闯了关东。路上，没有饭钱，也没有店钱。白天，走到哪要到哪，晚上，走到哪睡到哪，村头、庙后，磨道、碾房，都是我们临时的客店。四个月的光景，走了四千里路，遭的罪就不用说了。到了长春，实在不能再走了，爹娘就想住在这里。可是，在长春两眼墨黑，吃没吃的，住没住的，怎么办呢？爹只好去卖短工，挣几个钱，但

仍然不够一家大小的吃穿。为了贴补吃、烧，娘就抱着妹妹领着我出去讨饭、拣煤核。一进腊月，天冷了，叫工的也少了，爹常常困在家里没活干，生活就更苦了，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大人还好说，我和妹妹饿得直哭，爹和娘看着真揪心。实在没有办法，爹和娘一合计，就含泪把小妹妹抱到四马路新市场卖掉了。眼看买主抱走了妹妹，爹娘的心就象刀割似的！他们流着眼泪回了家，一想起妹妹来就哭。卖妹妹的钱，维持了几个月，又光了，仍然没有活路！爹听说东山里（磐石县）好混些，决心挪挪地方。第二年开春，又领我们逃到磐石。谁知在那里又发生了更惨的事情。

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中秋节，对有錢人家说来是个团圆节，他们酒呀肉呀的大吃大喝。可我们连当顿的下锅米也没有，爹爹愁得没有办法。我娘站起来，拿着筐说：“我到外面看看去！”我知道娘是出去讨饭，就赶出来说：“娘！快点回来，我饿呀！”娘说：“娘知道。黑子，不要闹你爹，娘去去就来。”我可真高兴，天真地想过节的时候，也许好要一点，过一会，娘一定能挎回一些吃的东西来，就耐心地等着。可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还是不见娘回来。爹说，她大概是迷路了，或是贪了黑睡在哪里，就领着我去找。从早起到晚上，走了十几个村子也没找着。一直找了两、三个月，也没找到娘的影子。我娘就这样失踪了。

娘失踪以后，爹又领我从磐石县走到双阳县，在哪也落不下脚，最后，又绕回长春，住了花子店。

当“油花子”

穷日子实在不好过。我看爹身体一天比一天坏，腰也有些弯了，时常半夜起来咳嗽。我盼望自己快点长大，也干点活，挣几个钱，好减轻爹的负担。

我十二岁那年，经人介绍，进了益发合榨油厂，当了童工。当时，我们被统治阶级叫“油花子”。

“想吃益发合的饭，就得拿命换”，这话一点不假。只要你一进这个厂的大门，就象卖给了油厂老板一样。一天到晚，得拚着命给他们干活。那时，我应名是个童工，干的活却并不比大人轻，整天跟着榨油的爬油垛子抵草。当时，榨油时油垛都得用草垫着，上面一加压力，草被压出来老长一块，就必须立即把这草顺着缝抵回油垛内，要不，豆油就会顺着草流掉，淌不进油沟。油沟，就是油垛子底盘上淌油的小沟，常被豆饼沫堵住，也得随时掏沟。抵草，开始时，是围着油垛子来回转，手脚一齐忙。油垛子越垛越高，抵草就更困难了。垛到八块豆饼时，我就够不着了，就得用小板凳垫着，站在凳上往里抵。等到十三块豆饼都垛完了，另起油垛时，还得从凳上跳下来。这样上来下去的，中间还要不时地掏油沟，每天都累得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累带饿，实在受不了啦，就站在油垛后面偷着哭。

那时，资本家想尽办法，从我们身上赚钱。我每天都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资本家每月只给我两元五角工钱。这



还不算，他还成年到头不给我们饱饭吃。我原来想，不管咋的，榨油的厂子，菜里总会有点油吧。谁曾想，菜里连个油花也见不到。工人们都说：

“益发合油厂的泔水都不脏衣服！”我们榨油工人的特点，就是浑身是油，但肚子里没

油。这么糟的伙食，那样沉重的劳动，哪能不伤人！这个厂的工人，一多半都是黄皮拉瘦，面无人色。

资本家对老年工人和有病的工人更狠。看门的老更夫牛振富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了，资本家早想把他赶出去，但他到哪里去呢？他向资本家苦苦地哀求，才被留下。可是狠心的资本家却让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看守两个铁门。牛振富上了年岁，腿脚不灵便，看守两个铁门是很吃力的。有一次他刚刚关上东门，不料西门又来了火车，他赶紧去开，但已经来不及了，火车呼的一声撞进来，两扇铁门和牛振富的尸体一齐飞出好远去。工人们听了，都赶到现场来，要求追

查責任。資本家無奈，才答應給口棺材，就算了事。

工人一旦得了病就更苦了，病輕得照样干活，病重了，資本家就把你撵出厂子。工人曹理是管漿豆的。五十多歲的人，每天都要爬到几丈高的二楼上去，楼上尽是一根根碗口粗的暖气管子，又悶又熱，再加上他餓得身子發虛，有一天不小心便跌了一個跟頭，摔在暖气管子上，大腿上登時就燙起了有一巴掌寬的水晶晶的大泡。第二天資本家却來催他上工，說不上工就要撵出厂子。曹理要求給買點藥，治一治，資本家却哼着鼻子說：“打了一輩子油，都沒拿豆餅照照，你掙多少錢，還要買藥？你能還得起嗎？”這個老工人就只好這樣硬挺着。開始，他的腿還能走動，後來漸漸地爛了，癱在炕上。資本家看他沒什麼指望了，便一天三次催他出廠，還告訴廚房不給他打飯。在那一年封廠時，曹理被資本家開除了。工友們湊了幾個錢起了張車票，把他抬到火車站上，送他回關里去找親戚，聽說第二年春天他就死了。

“封 廠”

封廠，是資本家剝削壓榨工人的一種手段。每年陰曆五月節到八月節這段時間，陳糧用完了，新糧還沒下來，廠子里沒有多少活計，資本家就把工人全都趕出來，這就叫封廠。封廠時，限期三天叫工人一律離開，如果三天之內離不開，就要倒扣伙食費。封廠，對工人來說就是失業。但是資

本家为了榨取高额利润，哪里还管工人死活。

每年封厂时，只留几个童工敲锅炉里的水锈。敲水锈的活最损害身体，最容易得肺病。解放后，都是身体强壮的成年人干这种活，还发给口罩等保护用品，每天还给保健费，做保健菜饭，喝白糖水、茶水，根本不允许未成年的孩子干。可那时候，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全部雇用童工。我们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得从炉门钻进去，钻到锅炉里，一人旁边点一支蜡，照监工事先划好的格子排好，接着就用小锤敲打起来。十几把小锤一齐敲打，震得耳聩脑胀，飞起来的粉灰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锅炉是由两层圆柱形的大铁管套成的，两层铁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人就在这二层之间干活，躺不下，蹲不住。只有用膝盖顶着前面，用屁股靠着后面，才能举起铁锤，胳膊还伸不直。这样一干就是十二、三个小时，除了吃午饭出来一次外，谁也不许出来。监工的在炉门守着，看谁一露头，就是一棒子。这样干不了几天，两个膝盖和屁股，全都磨破，一挨到锅炉铁板，就象针扎的一样痛。有时两腿麻木了，出了血还不知道，血和粉灰凝到一起贴在肉上，往下一揭，痛得直冒汗。

有一个童工名叫孙宝田，他想一个办法，叫我们每人拿一块麻袋片垫在膝盖下，疼就轻些了。后来，这个办法被监工的韩金堂发现了，就把我们挨个打了一顿棒子，大伙恨得牙根直痒。一天，孙宝田把一只猫全身蘸上油，趁着监工的睡早觉的时候塞在他被窝里，等他吓得跳起来的时候，身

上、被上已經全是油了。虽然大伙出了口气，可是监工的却恨透了孙宝田，說什么也要把他撵出厂子。我知道孙宝田沒爹沒娘，出去就得蹲馬路，不小心还得被抓去当劳工，就让他藏在鍋炉房的煤仓里，天天冒險偷着給他送飯，寻思躲几天也就沒事了。可是，监工的派几个腿子，到处去找他。孙宝田一直躲了两个多月，实在忍不住了，他說：“认可蹲馬路，要飯吃，也不受这个气了。”他就离开了厂子。

斗 爭

我二十一岁那年，到油厂的机器房干活。第二年，得了一场伤寒病。剛发病的时候，还能挺得住。后来，病越来越重，就想請个假。监工的韓金堂却硬逼着我去干活，他說：

“你不用装糊涂，頂不住也得干！”我又上了两天班，就病得起不来炕了。資本家怕我死在工厂，撵我回家。我想起那些有病惨死的工人弟兄的情况，知道向資本家提出要求也是沒有用的，就橫着心叫我爹把我背回家了。家里吃飯都困难，哪有錢治病呢？只好硬挺着。足足躺了三个多月，总算熬过来了。但是，我爹却由于照顾我，得了重病，不到半月就死了。

我爹死后的第二年，有个乡亲給我提亲。說实在的，我只当是个笑話；我想，一个人拚死拚活地干，混碗飯吃都不易，怎么好再让别人跟着遭罪呢？再說，一結婚，資本家就得开除我，飯碗就得打掉。因此，我再三不肯。不料，工友們却替我答应了下来。他們說：“成家吧，黑子！这是人家

看得起咱們‘油花子’啦。別看我們都四、五十歲還沒個家，正是爲了這個，咋的也要幫你成家。咱們應該從你這開頭，打破過去的一成家就要被開除的老規矩。”於是，于文彬等幾個老工人就跑到資本家那裏去交涉。資本家晃着他那個大腦袋冷笑着說：“真是耗子跳到磅秤上，也沒量量他有多重？成個家你叫他用啥养活？”于文彬說：“那就不用你操心了，只要成家就能養家。”資本家說：“那不見得吧，看看你們‘油花子’裏有幾個養得起家的？”于文彬說：

“閑話少說，成了家你到底開不開除他吧？”資本家說：“咱們廠的老規矩不能改。”工人們對資本家的這種態度，都很氣憤，堅持鬥爭。再加上當時時局很緊張，小鬼子就要倒台，資本家也想留個後路，就把話拉了回來，答應結婚後不開除我。於是，我在工人弟兄的幫助下，破例地成了家。

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長春，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工人的生活根本沒有保證。我一個月的工錢只能買七、八十斤糧，根本無法維持家庭生活。有一天，我們機器房的十二個工人一核計，決定要求資本家給漲工錢，不漲就不干活。第二天，我們誰也沒上班，整個工廠停工了。這時候，我們推選王志遠、劉漢臣去和資本家交涉，要求資本家給漲工資。資本家起先態度很硬，說不能漲。我們就停工一天。資本家有點沉不住氣了，派幾個人來說合，讓我們先上班，說工錢好商量。我們不答應，又一個夜班沒上工。資本家慌了，第二天一早八點鐘，他就答應給我們漲一

倍工錢。大伙一核計，目的达到了，就在这天下午四点钟上了班。这次小規模的罢工，也就算胜利了。

翻 身

一九四八年，长春解放了，我們“油花子”翻身了。接着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工資不仅沒有减少，按照实物比較，比过去增加了很多，我开始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工人的关怀。我們工人們不仅在經濟上翻身了，而且在政治上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我在一九五五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油厂工作三十多年了，看看现在，想想过去，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一九六四年我得了病，領導上让我休息。我休息了一年，工資还是照发；書記、厂长、工会主席常到我家来看我，怕我生活困难，还时常給些补助。想起这些，我对党就万分感激，对新社会就更加热爱。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我的觉悟不断提高，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我也能克服，保证完成生产任务。今后我一定要听党的話，永远跟着党走。